

邊 彭 集



關 鋒 著
山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邊 詩 集

关 鋒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济南

边 鼓 集

关 锋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经9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山东分店发行

*

书号：1910

开本 787×1092 1/32 · 印张 4 7/8 · 字数 95千

1957年10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14,500

统一书号： 3099 · 127

定 价： (5) 0.32元

前 記

收在这里的文章，都不过是打打边鼓的；所以我把它題名为“边鼓集”。

这些文章都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写的。和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是关系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每个社会主义者、爱国人民，都不应也不能沉默。因此，我也拿起“土压五”来参加战斗了。而且，确是“心溃涌，笔手扰”，不能不写。

因为是拿着“土压五”参加战斗，就难免有打得不准、不狠的地方。特别是六月份写的几篇短文，现在检查起来，还有某些观点模糊之处；编这本集子时，根据今天的认识水平，作了一些修改。

这个集子的第一部分是“短文”。当写这些文章时，是想学着写写杂文的。杂文应有一定的艺术性；那么，我的“杂文”还是算不得杂文的。但是，我还是取其形式的“短”，取其是一些“杂文”的习作，把它们编为一类。第二部分是长文章。这些文章是就它们内容的比较接近而排列先后顺序的。

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的进攻中，

可以說把資產階級的“十八般兵器”都使用上了。從這場鬥爭中，使我們更深刻地体会到：系統地深刻地批判資產階級的思想、觀點、哲學的和社會科學的“理論”，是何等重要。這個理論戰綫上、思想戰綫上的鬥爭，還會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廣泛而深入地展開。至於收在這個集子裏的文章，却是很膚淺的，作為一個理論工作者，我感到慚愧！——還是不說這些話吧！加強黨性鍛煉，加強理論學習；理論上思想上的戰鬥任務還在前面！

發表這些文章的報紙、刊物的編輯，都曾經給了作者不少的幫助；在這裏，我向他們致以謝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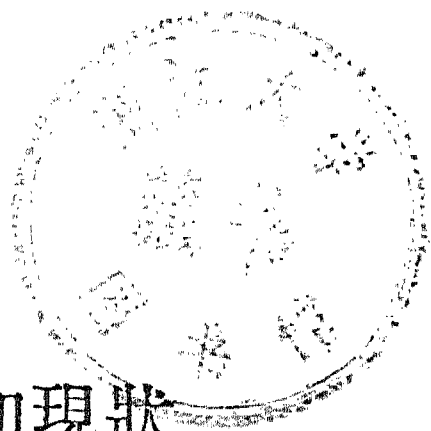
作 者

1957年9月15日

目 录

前 記.....	1
笔杆、文人和現狀.....	1
“教条”之类.....	4
章乃器底邏輯的秘密.....	6
論說真話.....	9
革命和“綉花”.....	11
他們是人民的“功臣”.....	14
是非和溫情.....	17
談动机.....	19
“升仙”的神話.....	24
“一本書主义”及其他.....	26
論雅量.....	29
——評“新港”七月号的三篇杂文	
超階級的友情論，可以休矣！.....	35
論“小罵大帮忙”.....	38
論報紙的“趣味性”.....	41
論“一边倒”.....	44

批判費孝通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气”.....	47
“不通”和陰謀.....	60
——斥吳景超的“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嗎？”	
駁所謂“一切領導階級都有局限性”.....	69
談談友誼和階級性.....	81
略論人性和階級性.....	90
为什么必須反对絕對平均主义.....	103
斥資產階級右派的詭辯論.....	117
何物“理性主义”？.....	129
反抗精神、叛逆性格及其他.....	138
附录：說“稜角”.....	146



笔杆、文人和現狀

前些天，在一个高等学校的辯論会上，听到一位青年說：“不滿現狀是青年人的美德。”我有些糊涂；她不滿的倒底是何种現狀呢？

近日讀报，見到一位楊玉清先生說：“文人的笔杆天然反現狀的，真正的文人是反現狀的，从古以来好文章都是反現狀的”。反現狀者“仁人志士”也；“歌功頌德”者不足道也。——这回，我更糊涂了；头腦发昏，眼睛发花，面前出現了大批“真正的”文人，头戴虛无帽，身穿虛无衣，坐下虛无椅，伏在虛无案，揮动着一枝有毛的笔，大做其好文章。我悄悄地走过去一瞧，他們做的題目都是“反現狀”；破題一句都是：“反現狀者，反对現狀之謂也”。可惜，底下的字我一个也不認得，大概是天書吧！我正在納悶，突然有几位文人拿起硯池猛地向我头上打来；还有一位厉声高喊：“杀死这个偷看天机的坏蛋！”我赶紧跑，摔了一跤。

面前的“真正的”文人不見了，只剩下我自己发昏。

发了一陣昏，再拿起报纸来看，左鑽右研还是不能領会这位先生的“反現狀”的妙論。沒有法子，我还得請教“教条”：

笔，沒有階級性；可是，它自己不会做文章。

人，在階級社会里是有階級性的；文人，首先是人，然

后是文人，如果他也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飞上天，大概也得有阶级性。

现状呢？一切事物都是具有内部矛盾的；社会现状，也有它的正面和反面，有新生的方面，有衰朽的方面，有革命的人民，也有拖着社会倒退的反动派。我不知道“仁人志士”们反对是哪种现状？帝国主义也是反现状的“英雄”，他们拚命要把共产主义世界这部分现状反掉。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在拚命地反现状，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巍然存在这种现状反掉。他们和他们的文人，不知能不能做出好文章来？算得算不得“仁人志士”？

归根结底，问题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反的是何种现状？保护的是何种现状或争取的是什么？

只反对，反对一切，任甚也不保护，不争取，更不歌颂——这是谎话或昏话。其实，有反对必有所赞助，有剷除必有所保护，有暴露必有所歌颂。反对白，岂不是赞助非白？连白和非白一起反对，岂不是赞助虚无？而“虚无”是给另一种“有”开辟道路的。……

耳边一声高喊：“咄！你不要给我上政治课，我是给你治病的！”——原来我又跌进了发昏第二章。

这回是在医院里，我站在一位医生的面前。我俩的“目标”是一致的。我是请她帮助我反对我的“现状”的。所以只好听她的吩咐。

“本大夫是以反现状论著称的。你的基本现状是活着，其次是带有病菌。所以……”她说就亮出了一把明晃晃的手

兪刀——“應該消灭你的基本現狀；那，您就永远的絕对的健康了！”不由分說，她操刀向我的咽喉刺来。

这一吓，倒把我吓明白了：

原来她和我的目标是不一致的，她跟我有仇吧？要不，她怎么反对我活着的現狀、操刀向我的咽喉刺来呢！

（写于6月7日）

“教条”之類

似乎最近“教条”又多起来了。据说：“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这是教条；“资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一定要剥削”，这也是教条；“资产阶级应当改造”，这更是教条……。以这个标准去量，我们的报刊、书籍、講演等等，不是教条的，确是微乎其微。是教条，自然应该打倒。打倒了这些教条，自然就立起了“新”东西：“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现在的资产阶级不剥削”，“定息万岁”，“资产阶级——不，应写作‘资产阶级分子’，我没有权力除去人家的面纱——和工人一样”。这不是教条，乃是圣经。

不过，这是“反教条，立圣经”的第一章。那下一章该是这些吧：资产阶级从未剥削，“剥削”者教条也；本来没有阶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教条之老祖宗也。

再下一章呢？该是资产阶级万岁，无产阶级罪该万死了吧！

我忽然想到早年的胡适。那时他还没有“过河”。当时，马列主义在中国开始了广泛的传播；大概有些宣传文章也有一些“教条主义”的气息。于是，勇士走出来大张讨伐了；那檄文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骨子里是：反对传播马列主义；传播马列主义者鸚鵡留声机之类也。至于宣传

实用主义当然不在此例；因为实用主义不是“主义”，而是“圣经”。后来，胡适就从这里一步步地走过河去，成了“过河的卒子”只能“向前”了。

据说：历史总要重复，第一次是丑剧，第二次是讽刺喜剧；然而，这大抵是不确的。可是，我们的反“教条主义”的“勇士”，为什么和当年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胡适类似？

我希望我的联想，只对“一半”。

（写于6月11日）

章乃器底邏輯的秘密

用謊言掩盖事实，是必須創造一套奇妙的邏輯的。謊言，滾它的吧；然而，那“邏輯”却是耐人寻味的。

章乃器底邏輯，其一：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有本質的區別；但資產階級分子却和工人沒有區別。不知他是不是按照這條邏輯生活？例如“面包和石頭有本質的區別，但這個面包和這塊石頭沒有區別”，因而每天既吃具體的面包、又吃具體的石頭？

不過，空論却有時候是有實用價值的。戰國時候有一個公孫龍，以“白馬非馬”論著稱。據說，有一天他騎着一匹白馬出關，關吏按照禁止馬匹出境的法令要扣留他的白馬。公孫龍大展“白馬非馬”之宏論，嚴厲批判關吏的“教條主義”；結果竟折服了關吏，承認白馬不是馬，讓他連人帶馬混出關去。不過也還有另一說：“關吏不聽，此虛言難以奪實也”。^① 實情怎樣，不得而知；但究應感謝歷史家的記載，使我們知道：空論之實用價值，在於蒙混過關也。——章乃器底邏輯的秘密在此乎？

章乃器底邏輯，其二：定息是不勞而獲，但不是剝削。

^① 據孫馮翼輯“桓子新編”。

發燒到四十度的人，大概也要說：“息”，既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從地下鑽出來的，而是勞動創造的。不勞而獲“定息”，豈非平白無故占有別人的勞動果實？是的；可万万不能叫剝削！

空論，乃至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有時也是有實用價值的。據說有一位姓忌名諱的“數學家”，忌諱“2”，他把2寫作“1·1”，讀曰：“兩個1”。雖然，他心裡明白：“4”就是兩個“2”，而“兩個1”的讀法，實際上也沒有離開那個該死的“2”；但是，這，的確可以安慰、鼓勵那個忌諱的心靈。——章乃器底邏輯的秘密在此乎？

我們打開了這道鎖，可還沒有找到“寶藏”。章元善先生說：章乃器“素來就把自己打扮成工商業者唯一的知心朋友，‘我與你有共同語言，心心相印’，只有他知道工商業者的心靈深處。共產黨要改造資產階級分子，只有他是對他們表示同情的。他這立場為自己博得一個‘市場’……。”——謎底，原來是在這裡。

當前資產階級分子具有留戀資本主義和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兩面性。有兩面性就不免“寒溫交爭”。而經過“交爭”就要升華，就會轉化為勞動人民。而章乃器却要抽掉其一面性，使其去溫就寒，而結冰。其理論曰：定息不是剝削，資產階級分子同工人一樣——不知為什麼，他沒有想出一個更好的名詞代替“資產階級分子”之稱？——資本主義魂靈從這得到了安慰和鼓勵；心安理得拿定息，定息二十年豈不太短？理應“定息萬歲”！章乃器的工作如果告成，那，資產階

級分子确是要只剩下一面性的；然而，却是并不美妙的一面性。抽掉資產階級分子的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性——章乃器底邏輯秘密之秘密，就在此乎？

我看，已經獲得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一面性的資產階級分子，是未必同意章乃器給他們动这种手朮的吧？

章乃器是什么“性”？从他底邏輯秘密之秘密，就可斷定：他只有一面性——資產階級性，而且是最頑固的資產階級的反動性。

（写于6月16日）

論說真話

譚惕吾是“主張”說真話的。可是，盧郁文說了几句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領導的話，就被她判断为假話，并斥之曰：“无耻之徒”。从这里我們倒可以看出譚惕吾主張說真話的真諦。

什么是真話？真話者心里之話也——在这个意义上，对“真話”的理解，我們和譚惕吾及其他右派分子是有共同語言的。大概她（他）們也不会說：心里这么想、嘴里那么說才叫真話——尽管她（他）們常常是心口不一。然而，譚惕吾舌尖一轉，却彈出了她的妙論：盧郁文等說的是假話，为什么？因为他們說的話是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話；我和我的朋友說的是真話，为什么？因为說的是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話——这就是譚先生心目中区分真話、假話的标准。我們固不否認譚先生和她的右派朋友說的是真話；的的确确，她（他）們嘴里說的是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心里想的也是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不过，也証明了她（他）們說了八年的假話：心里反对社会主义，嘴巴上拥护社会主义）。可是，她有什么根据，断定盧郁文說的是假話，断定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言論都是假話？用句不“文雅”的，但却是如實的話來說，这就叫作：“狗眼看人低”。我們可以告訴譚先生：拥

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言論出諸于广大人民之口，是确确实实的真話；虽然，这样的話曾經出于譚先生等人之口，那是确确实实的假話。并且，广大人民的話之所以真还有双重意义：心里有什么嘴里說什么，一也；与客观实际相符合，是真理，二也。譚先生等人的真話，却是“真”而又假，所謂真，心里話也；所謂假，由那条反社会主义之心发出来的話，与客观实际不符合也。譚先生等人會說，“所謂假”我可不信服。怎么能信服呢？人家的心是夢想資本主义、夢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的；只好答曰：信不信由你！

要說譚先生完全不知道广大人民的心和她（他）們的心不同，也未免有点冤枉；她未必不知道广大人民是真心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的。那么，为什么要把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言論判断为假話，并且还罵人家是“无耻之徒”？不难理解，这正是一种战術。要兴歪风就必须把正风压倒；要壯反社会主义謬論的声势，就必须塞住广大人民的嘴。怎么塞？譚惕吾的“真話論”就是一条办法：說假話者不道德也，“无耻之徒”也；你說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話，乃假話也；于是，嘴被塞住了。然而，广大人民却懂得：有兩种心，有兩种“真話”；我們說我們的真話，你說你的“真話”吧！真正的“无耻之徒”，是逃不掉历史的公道的。

（写于6月22日）

革命和“綉花”

右派分子特別惡毒地咒罵建國以來的幾個大的運動，什麼“統購統銷搞糟了啊”，“肅反侵犯人權啊”，“要殺共產黨人啊”等等都來了。這沒有什麼奇怪，只是因為：沒有那幾個大的運動，就沒有人民民主政權的鞏固，就沒有社會主義……。一句話，沒有這些運動，就沒有人民的天下。所以，我們對他們給以堅決的反擊就是了。

可是，也有少數的朋友對這個問題搞不清楚。他們跟右派分子的出發點完全不同，他們也不大同意右派分子的“糟得很”的議論；但是，總覺得難以完全否認“糟”。其原因，就在於以“綉花”的眼光看革命。毛澤東同志在三十年前曾經寫道：“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綉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① 這些話的基本精神，還是我們搞清問題的指南針。

就說肅反吧。有的朋友這樣想：“肅反不用羣眾鬥爭的方法不好嗎？象審干那樣做法，只是調查材料；調查確實了就法辦。”這種想法的動機是好的，然而，却是行不通的。原

^①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8頁。

因很簡單，就是因为：肃反所对付的对象是反革命，而且是鑽到党、团、国家机关、羣众团体内部来的暗藏的反革命。肃反是对待这样的敌人的事，是极其激烈、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而审干是我们内部的事，审干的方法是对待自己的同志，用这种方法对付敌人怎么能行？譬如，把我们所掌握的材料都攤給肃反对象吧，若他真是反革命呢？岂不被他摸了我們的底，更頑强起来！再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用各种方法把自己隱蔽起来，單凭公安机关調查怎么能行呢？可是，既是反革命就不能沒有反革命的活动，有活动就不能逃过广大羣众的眼睛。那么，发动羣众进行斗争就可以揭露他們；就是不能最后解决問題，也可以給專案处理打下基础或是提供了調查綫索。有些朋友对这一方面也是承認的；可是，他們总还是搖頭：“可錯斗了一些人啊！”其实，錯斗的是极少数的，而且及时得到了糾正；这么复杂的阶级斗争怎能保証不錯斗一个人呢？要事先有一个禁令：絕對不准錯斗一个人，那就肃不出反革命来。錯斗极少数人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我們党中央有“彻底肃清反革命，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針，有运动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針，有“有反必肃，有錯必糾”的方針，这就保証了完成肃清反革命的任务，而不出大毛病。事实也正是如此：肃清了反革命，这是多大的成績！对被錯斗了的极少数人，我們賠礼道歉；他們为国为民設想，也应该原諒。

作事，有可以避免的錯誤，总也有难以避免的錯誤，何况肃反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斗争！要做，就难以完全避免小

錯誤；要想一点小錯誤不犯，就要犯絕大的錯誤——什么也不做。这也是一条辯証法。事实証明：肃反成績是基本的，錯誤只是少数的、局部的。公安机关的專門工作与发动羣众相結合是一条成功的經驗，不是因此多出了偏差，而是少出了偏差。

有的朋友說：“这道理是对的，但我們机关斗了一些人却只肃出一两个反革命来，我們机关的肃反不能說成績是基本的吧！”也許这个机关斗争的面是搞寬了，那是錯誤的，但是因此否定成績是基本的，却是不对的。一两个反革命得了手，對我們的破坏就是无穷的；肃出来岂不是很大的成績？再說被錯斗的，絕大多数也是虽然“查无实据”，但却“事出有因”。經過肃反，搞清楚了，自己放下了包袱，国家对他可以大胆信任了，“偏”糾了，“怨”解了，因而可以增强团結了，这岂不也是成績？

革命不是“綉花”，我們不能以“綉花”的眼光看革命；否則，是越看越糊涂的。对于肃反运动是如此，对于其他几个运动也是如此。

（写于6月21日）

他們是人民的“功臣”

近来对积极分子的責备相当多。有实事求是的批評；也有尖銳的訶斥。所有尖銳的訶斥，表面看来都是一样的；而究其实，却有根本性質不同的兩種。这是應該严格区分的。

一种是来自右派分子的。右派分子的“大方向”是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因此，他們当然要痛罵拥护社会主义、靠攏共产党的积极分子，痛罵党团员。他們虽然有时也說中了某些积极分子的缺点——当然要故意扩大，而且还要捏造——但这是为他們的总目的服务的；企图把积极分子罵倒、罵散，以售其反社会主义的奸計。他們說了一千句話、一万句話，究其實質不过是罵共产党、罵革命、罵积极分子对社会主义事业积极。对于右派分子的这种惡毒的攻击，應該予以坚决的回击。

一种是来自某些朋友的。其中有一些話說得很难听。但是，他們的动机、出发点和右派分子是根本不同的。他們是贊成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領導的。其中有的朋友有很大的热心，他們对积极分子抱着“恨鉄不成鋼”的态度，然而缺乏冷靜地全面地分析，于是对积极分子責备得过火。对于他們的热心，我們應該感謝。有的朋友，因为受到了某个积极分子的缺点錯誤直接伤害，而不冷靜，以至气憤填膺說出了难听的話。这种情形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必过份苛責的。总之，

这些朋友的批評、責备，对于我們整风是有帮助的；絕對不能因为話不好听而拒絕人家，更不能把这种責备和右派分子的謬論混在一起（当然，一些过火的不实事求是的批評，也要通过討論搞清楚）。

但是，有一点也需要向这些朋友們說清楚，就是：“他們的革命大方向沒有錯”，他們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方向下，积极努力做了許多工作，对国对民是有重大貢獻的，他們对社会主义赤胆忠心，他們是真正的人民的“功臣”（当然，个别的假“积极分子”不在此例）。三十年前，毛澤东同志对湖南农民运动中的貧农的估計，可以做为我們考虑这个問題的指路明灯。当时的右派分子大罵貧农为“痞子”，毛澤东同志却歌頌他們为“革命先鋒”。毛澤东同志写道：“沒有貧农，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击他們，便是打击革命。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① 我認为：这些話对于积极分子，从原則上說来也是适用的。积极分子再有缺点、錯誤，他們为社会主义事业而积极，他們靠攏共产党沒有錯，也就是說，他們的革命大方向是完全对的。現在的情形和毛澤东同志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不同；現在党中央的領導是正确的、坚强的，羣众的觉悟也比三十年前高得不可比量了。但是，实际工作却还是靠着党、团基层組織、广大的积极分子和全国人民来做。积极分子，在其中却起了帶头作用、桥梁作用、骨干作用。我們想想，沒有这些积极分子能够行嗎？不行，絕對不行。

^① “毛澤东选集”第一卷，第22頁。

曾經有人这样評論共产党：“上层好，中层了，下层糟。”这是右派分子的論調。这論調的根本全在那个“下层糟”的“糟”字上。这是他們企图否定共产党、否定一切工作的張本。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領導的朋友，万万不要上当。

“恨鉄不成鋼”的朋友們說：“积极分子若是全沒有缺点錯誤多好啊！其中有人缺点錯誤太严重啦！”这种热心太好了，太应该感謝了。可是，設想积极分子沒有任何缺点錯誤那是不现实的；他們的覺悟，分析能力，办事能力，是得在實踐中逐步提高的，缺点錯誤是需要斗争中克服的。我們的工作成績是巨大的；但也是有缺点有錯誤的，甚至有些是很严重的。对于积极分子說来，当然也不会例外。因此，才要整风。积极分子的缺点錯誤，应该在整风中克服。但是，我們对积极分子要一保护、二批評；保护他們的积极性，实事求是地批評他們的缺点和錯誤。我們希望朋友們，對他們也要这样。

朋友們对积极分子的批評、指責，如同对其它方面的批評、指責一样，無論如何，对于我們糾正缺点、改进作风是有幫助的。但是积极分子在“革命的大方向上沒有錯”、是人民的“功臣”，这一点，也是应该肯定的；絕對不应该因為他們有一些缺点和錯誤，就否定了这个基本方面。否則，就会被右派分子利用，来攻击党的。积极分子自己也应该明白这一点。对于右派分子的攻击，应该坚定：他們攻击的正是这个革命的大方向，他們的惡罵恰好証明我們做对了。我們要予以坚决的反击。

（写于6月21日）

是非和温情

右派头子罗隆基拉攏邵慈云时，这样說：“共产党只講是非，不講温情，象咱們小資產階級是講点温情的”。

不愧是老狐狸！罗隆基还真是有兩手。他确是看准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一个根本弱点：是非不分，温情主义；而且也很知道温情主义的斤量：你对是非馬虎一点，来点温情主义，就帮了右派的大忙了。当然，罗隆基之流，并不是不講“是”“非”的，而相反的是“是”“非”分明的；君不見他們高喊社会主义一切皆非，資本主义一切皆是嗎？他們不是为他們的“是”而斗争嗎？不过，他們的“是”和“非”是主观的，他們主观上認為“是”的，正是“非”，認為“非”的，正是“是”。拖着社会倒退的敗类的是非，就是如此。自然，他們又决不是什么温情主义者。他們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有不共戴天之仇，只有恨，那有一絲半点的温情。而說什么“咱們……講点温情”，那是“狐狸給鷄拜年”的詭計。他們对誰有温情？对反革命，对一切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渣滓。君不見罗隆基为反革命呼“冤”嗎？

不錯，共产党是最講是非的，一切要是非分明，尤其是和右派斗争——坚持大是、打倒大非，更是万分認真。但是，它也最有温情——对人民的热爱。坚持大是，打倒大非，对右派分子毫不留情，决不講“温情主义”，正是对于广大人民的深情大爱。而对于人民内部的是非，也要說清楚；但却是一保护、二批評，与人为善、“治病救人”，“温情”、热情的

帮助人们进步。很显然，越是是非分明，就越是对广大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对真理的热爱。

右派分子提倡不讲是非的温情，那是狼在猎人面前耍的花招。你温情一下，把它放过，它就自由自在的“温情”的去吃人了。

把是非和温情绝对对立起来，是骗人的把戏。其实，人们都是爱其所是、憎其所非的。有谁会反过来，爱其所非，憎其所是呢？天底下没有这种人。不过有些人，是非马虎，爱憎也不分明罢了。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常常是这样的。然而，是非模糊，或是是非不分，一律对之温情，那也就偏袒了非，冷淡了是。在阶级社会里，人对事有所爱，必有所憎；你对右派分子有温情主义，也就是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缺乏热爱。诚如鲁迅先生所说：能憎才能爱，能杀才能生。

无产阶级所认为的“是”，是客观真理；无产阶级的“温情”（或者叫“热情”更适当一些）是对于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唯其如此，所以对于吃人的恶魔是极端憎恨的。无产阶级的爱是伟大的，憎也是伟大的。而温情主义者则缺乏这种伟大的爱，也缺乏这种伟大的憎，所以常常稀里糊涂地帮了坏人的忙，以至被拖下水去。这一点，右派分子倒是心里明白：你接受了温情主义，我就可以捕住你，为我效点劳。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温情主义是无足轻重的小毛病。

右派分子是我们的好“老师”，但需要从反面来学习。我们看到右派分子是怎样欢迎温情主义、极力要勾起某些人的温情主义，他们把温情主义的斤量看得多重，也就懂得了为什么必须坚决彻底地克服温情主义了。

（写于9月4日）

談 动 机

右派分子受到全国人民的同声指責和理正詞严的批判以后，想出了种种詭計，企图蒙混过关。其詭計之一，就是表白他們的动机是好的。他們說：“我的言行，客觀效果是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領導的，但是，我的动机是好的啊，我原是想帮助党整风的。”“好心人不是也可能做出坏事来嗎？”这是“魚目混珠”式的騙人鬼話。我們明白：右派分子絕對不是在工作中犯了一般性的錯誤，而是犯下了不可饒恕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它跟好心人在工作中犯的錯誤，是根本不同的。这两件事有着天淵之別。

我們所說的好心，好的动机，就是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有了这样一顆好心，才可能把工作做好。但是，一个革命者光是有好心，有好动机，还是非常不够的，还不能保証不犯錯誤。只是有好心，还可能把問題看錯了，按着錯誤的看法去办事，就会做出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坏事来。用我国的一句古語來說，这就叫作：“事与愿違”。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形呢？

这是因为客觀事物非常复杂的緣故。一个人虽有好心，但思想方法不对头，有主觀性、片面性、表面性，就不能認

識客觀事物的規律，按着客觀規律去辦事。這當然就要碰釘子，犯錯誤。例如一個同志的主觀願望是鞏固合作社，把社办好；這心當然是很好的。但是，由於思想方法有毛病，却找錯了辦法；他竟不顧客觀情況，不管生產如何，片面的過多的積累公共財產；結果使得多數社員降低了收入，損傷了社員的勞動積極性。這樣就把好事辦成了壞事。當然，這個同志若是確有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好心，當他的做法已經顯露出嚴重惡果來的時候，他就會沉痛檢討，堅決改正，而決不會計較個人得失，個人的面子。象這種情形，在我們的一般工作人員中，並不是很少見的。

不過，我們上邊舉的還是一個很簡單的事例。世界上的許多事情，却是要比這複雜得多的。有些事，前人沒有做過，人們沒有經驗，它和各方面的聯繫又特別的複雜；就是做錯了，惡果也還不是一下子就暴露在人們的面前的，甚至從表面看來，從暫時利益看來，那樣做還象是有很大的好處，或者確實也有一點點好處。思想方法有嚴重的主觀性、片面性、表面性的好心人，就可能只看表面的暫時的“好處”，為表面現象、個別的或局部的情形所迷惑；而固執地以為只有按着他那種錯誤做法去做，才是唯一的有利於社會主義的，以至惡果逐漸明顯的暴露出來了，他還是看不見。這樣，在一定條件下，就會犯長期的嚴重的錯誤，損害社會主義的事業。這對於好心人說來，是一場悲劇。好心人，而有主觀主義，在極其複雜的情況下，犯這種錯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好心人做出壞事的情形就是這樣。右派分子以好心人作

坏事是解释不了的。难道好心人，会反对社会主义吗？会反对肃反吗？会反对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吗？……不会，绝对不。思想方法有严重的毛病，也只可能是在做这些好事的时候，采取的方法不对头，做出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事来。

我们看看右派分子的行为吧，难道他们是出于好心做出来的坏事吗？不是，绝对不是。

右派分子是办的什么事呢？确凿的事实证明，他们并不是办社会主义的事办坏了，而是办的恢复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事。他们恶毒的污蔑新社会，攻击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咒骂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咒骂党员、团员、积极分子，咒骂劳动人民。他们仇恨共产党，仇恨人民，仇恨社会主义革命，人所共见。例如有的右派分子，狂妄地说：“我当了权，要杀几千万人。”他们到处“串连”，到处放火，唯恐天下不乱。他们故意造谣，颠倒黑白，聳人听闻，煽动群众。很清楚，右派分子和我们争论的并不是怎样把社会主义的事情办好，怎样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怎样加强党同群众的关系。恰好相反，右派分子是在攻击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挑拨和破坏党同群众的关系。一个好心人，难道会这样做吗？好心人，从怎样把社会主义的事情办好，怎样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怎样加强党同群众的关系……这样的动机出发，也可能出出错误的主意来，发表些错误的意见；但是，他决不会攻击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决不会挑拨党群关系。一个好心人难道会造谣吗？好心人也可能由于粗枝大叶，没

有調查，說的話不尽符合事实；但是，他决不会无中生有，故意混淆视听。一个好心人，难道会秘密拉攏、招兵买馬、煽动羣众，制造乱子嗎？好心人也可能发言偏激，但是决不会象右派分子那样，树立一派势力与党和人民为敌。

清清楚楚，右派分子的动机，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他們的阴謀破产了，想蒙混过关，就哭哭啼啼的对人們說：“我的心是好的啊，是为的社会主义啊！”有誰会相信呢？难道天底下会有这种人：我为了社会主义，所以我要反对社会主义，为了爱他，所以要杀他。思想方法有多么大的片面性、表面性、主观性，也是不会这样的；因为这是极其显而易见的事。

好心人办出了“坏事”，是由于思想方法不对头，本来打算办好事，結果却把好事办成了坏事。而右派分子却是蓄意办坏事。这并不是悲剧，而是惡作剧；“坏”，那正是他們的目的。这完全不是因为什么思想方法有毛病，而是由于那颗骯髒污濁的心。当然，他們的思想方法是再主观、表面、片面不过的了。他們的心坏，思想方法极端錯誤，所以就把1957年春天的形势估計錯了，他們以为社会主义不行了，共产党不行了，天下要大乱了，該他們上台恢复資本主义了。这些人阴謀失敗以后，所惋惜和痛恨地是他們的目的（打倒社会主义、恢复資本主义）沒有达到，而不是他們的行为損害了社会主义。

看看右派分子的罪惡行为，对于他們的动机是不應該有任何疑問的；那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了。

然而，却有极少数的人，对这个問題疑惑不解。

朋友！假若有这么一件事：一个杀人凶手，当场被捕，証据就在眼前；他辯解說：“我的行为，客观效果是杀人，但主观动机是好的，心是好的，是为的爱他啊！”你怎么看这种辯解呢？我想，你会毫不迟疑地斥之曰：“胡說”吧！但是，为什么对直接絞杀社会主义的右派，还怀疑他們是不是出于好心呢？

朋友！假若有这么一个造謠專家，謠言被揭穿以后，他辯解說：“我的行为，客观效果是造謠，而主观动机却是好的，是想說明事情的真相的！”你决不会相信吧！你会毫不迟疑的斥之曰：“当面扯謊”吧！但是，为什么对顛倒黑白、制造謠言、煽动羣众的右派，还怀疑他們是不是出于好心呢？

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答复，就是：犯了温情主义的毛病。因为有了温情主义，这么一个明显的問題也就看不清了。右派分子是要把祖国拖回苦难的深渊去的。反右派斗争是关系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大事。这是“温情”不得的。对右派分子温情，就是对祖国、对广大人民的冷酷！

（写于8月25日）

“升仙”的神話

地質部的薛毅是一个入党十八年的“党员”，在这个“不平常的春天”里，他蜕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很奇怪的。其实，没有什么奇怪，从薛毅的例子，我们倒可以看出这号人的底细来。

薛毅之流相信过社会主义没有？曾经为社会主义奋斗过没有？

相信过；但相信的是他们自己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即：他们能够“升官”“发财”的“社会主义”。①

十八年的岁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是的，有；也为“社会主义”奋斗过。但那奋斗是为的“升社会主义之官，发社会主义之财”。

薛毅这号人的人生观，就是：升官发财。在旧社会里，他们没有升官发财的机会，于是找了共产党。他们在混入党的时候，把自己的卑劣的动机掩盖了起来，却一直地在实际上为这个动机而奋斗。他们为这个卑劣的动机也“积极”过。当然，这号人在共产党的队伍里是不能如意的，所以他们在更多的时候是闹，闹升官发财，闹个人主义，达不到目的就

① “升社会主义之官，发社会主义之财”，是右派分子薛毅向党进攻中提出来的“倡议”。

罵。但那个时候，他們还不愿意和共产党鬧翻；他們想：社会主义到来之后，总是可以升官发财的。他們为他們心目中的未来的希望所吸引，也常常把卑鄙的动机收敛一下，有时也“积极”一陣子。就这样，他們在革命陣营里混了“十八年”。社会主义社会到来了，但还是既不允許他們升官，又不允許他們发财。他們彻底地大失所望了；所以只有响应社会上右派分子的号召，起来打倒这个社会主义，去建設他們的升官发财的“社会主义”了。

我忽然联想起了一个神話：有一位想升仙的信徒，白日和夢里都要升天堂，做神仙。他为此修行，也下过“苦功”。也是經過了十八年，天使来接他升天了。他很高兴，但沒有料想到只能他自己去。不是說：“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嗎？奴仆理应跟着去，老婆自然更不用說。現在竟不准，信徒大伤腦筋。据說，交涉的結果，是允許他全家人都去了；但太太却舍不得雞狗鵝鴨，而信徒也舍不得大瓦房和白沙田。据說再次交涉的結果，天使答应了他的請求：把信徒的田宅卷了起来，一并搬上天去。这回連一針一綫也舍棄不了了。信徒无牽无挂，坐在云头，悠然自得。但快到南天門的时候，信徒忽然对一樁大心事不放心起来：到天堂能升官发财嗎？是可能的嗎？但不放心，还得問一問。他的发問，自以为是符合“聖經”的。天使听了，却一气把他兜出了云头，摔往臭茅厠里去了，并指給他說：“那是你們的‘天堂’！”

薛毅之流，不过是这样的“信徒”！

（写于8月28日）

“一本書主義”及其他

作家，下決心要寫一本好書，好不好？當然，不能一概說不好。問題在於是从什麼動機出發的。如果从社會主義利益出發，寫一本乃至若干本好書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那是好得很的。但是，有一種人却是从個人利益的動機出發的，那就大成問題。這種“一念之差”，發展起來就會使人墮落，一直到不堪收拾。

反黨分子丁玲，就是一例。她的人生哲學，起名叫“一本書主義”，具體內容即是：“做了工作是別人的，寫出書才是自己的”、“寫出一本書，就誰也打他不倒”。很显然，“一本書主義”者，資產階級的極端個人主義也。這種人，寫書是全心全意的為爭取個人的名譽和地位。他寫不出還好，寫了出來，就成了他要挾黨、反黨的資本，成了他向人民驕橫、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資本。真理是管他不了的了；有了一本書了嘛，“誰也打他不倒”了！然而，客觀的邏輯是最強有力的，任何邪魔鬼祟必得在真理的面前倒下去，不管他是否三頭六臂的怪物。

寫出一本好書，人民是稱贊的，是承認和感謝作者的勞動的。但是，一個人民的作家，却決不會把功勞歸于自己而驕橫起來的。有了流血、流汗的鬥爭，才能有墨寫的鬥爭

史。难道可以忘記这一点嗎？沒有桑乾河人民的斗争，沒有全中国人民的斗争，哪能有你丁玲的“桑乾河上”。党和人民，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她。她長大了，長出了牙齿和利爪，却要咬死党和人民，多么卑鄙！无耻！

人民的作家，对于自己付出艰苦劳动所写的書，也是珍視的；然而，对他說来，这不过是进步的阶石，他永不自滿，他要克服缺点，給人民写出更多更好的东西。而“一本書主义”者写出一本書来，就要摆出債主的面孔，向党和人民討債了。自然，他們的算賬法是特別的，你看，丁玲借人民的光写了一本“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她自己就“变成”了“太阳”；那賬，人民給她作一万年奴隶也是还不清的。自然，他們的算賬法又是片面的，他們忘記了自己是吃着母亲的奶汁長大的。这没有什么奇怪，他們的人生哲学，原本是“宁可我負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負我”的。于是，一本書就变成了他們的坟墓，死在里边、爛在里边，——这是“一本書主义”者的必然結果。

而且，不止是文艺作家，搞科学研究的何尝例外。如果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把做人放在基本的地位，也是会成为“一本書主义”、“論文主义”或“副博士主义”者的。危險，当然也是同样的。我記起一九五六年提倡向科学进军的时候，有的青年人說：要為副博士而奋斗，把爭取作副博士看成人生目的。此后就真的閉門讀書，把党团組織生活、把社会工作看成額外負擔，把思想改造看作是別人找他的麻煩。党的号召是講得明明白白的，向科学进军是为建設社会主义服务，

但是，他們却充耳不聞，一心一意記住的、并为之而奋斗的只是“副博士”三个大字。把这种思想，叫作“副博士主义”，大概是名副其实的。我想：將來他作了“副博士”的时候，党和人民还管得了他嗎？其实，也許等不到他作“副博士”，早就被牛鬼蛇神勾引去了。

我想，人生在世，首先是做人，做什么样的人，怎样做人；其次，才是做學問，做家，做文学家、戏剧家、科学家……。祖国需要各方面的專家，而且是越多越好；但必須是无产階級的專家。如果忽視做人，那会成为什么人，做出什么學問来呢？

我的意思，归結为一句，就是：千万，千万，做學問別忘記了做人；而且應該把做人放在最基本最主要的地位。

（写于8月31日）

論 雅 量

——評“新港”七月号的三篇杂文

章伯鈞在他的反社会主义謬論剛受到批判的時候說，他有“雅量”，對別人的批判不予置辯。那是反咬一口的陰謀，“金蟬脫壳”的詭計。他的陰謀詭計早經揭穿，“雅量”這題目是不必作的了。最近，我讀了“新港”七月号排在最前头的三篇杂文，却又覺得還有再論一下“雅量”的必要。

彭鼎的“雅量”

作者考察了历史文献，說“雅量”的“意思实在很复杂，不能以一个定义概括之。”他举出了兩条。其一，雅量即立場坚定，这是淵源于三国故事：蔣干想劝誘周瑜投降，在羣英会上碰了釘子，向曹操回报說“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詞所能动也”。其二，雅量即“唾面自干”，据說这是唐朝婁师德教育他兄弟說的：“有人发了怒，向你面上吐口水，你若自己揩干，就是表示不高兴他的吐你，反对他的发怒了。口水自己会干的，倒不如笑而受之。”

举出了这两条，就可以据而“知人論世”了。

作者說，对于共产党员，立場坚定的雅量是必要的；“在某种意义上，‘唾面自干’的雅量”，“也是必要的”。据說这

是“为了对某些人士更表示尊敬起见”。难解的“某种意义上”啊！究竟是哪种意义？不管它吧，反正“唾面自干”总是：别人向你面上吐口水，你不能揩，要等它自己干的。作者又说：“单是前一条，容易做到（？）；单是后一条，也容易做到；而同时既要立场坚定，又要气度从容，这雅量，可有点难以做到。但既是共产党员，就非做到不可，还做不到，那么就在这次整风中来锻炼锻炼。”照作者看来，共产党整风应该添一条：整缺乏“唾面自干”的雅量的风。

难道共产党员真需要这种“唾面自干”的雅量吗？不需要，一百个不需要。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面上，向社会主义、共产党和人民的面上，吐了恶毒的口水，是坚决的回击呢，还是表示有“唾面自干”的雅量呢？

对右派分子决不能有这种雅量；对任何人也不需要这种雅量。党外朋友给党提意见有错误的地方，那是不能叫作给党的脸上吐口水的；而且那也不需要“自干”，是应该也可能说清楚的。党外朋友也并不需要共产党用“唾面自干”的雅量对他“更表示尊敬”的。

接着作者就来“批判”右派分子对“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的恶意曲解和攻击。其中有一条特别的就是：共产党能够（或应该？）“唾面自干”，可见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但是，作者出来与人争论，岂不违背“唾面自干”的雅量？自相矛盾，就不免心虚；所以作者赶紧交代说：“我说这话，也许是沉不住气，缺乏雅量。”

心虚的什么！我们根本不需要这种雅量！为了人民，为

了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对右派分子要坚决斗争、穷追到底！

也许我领会错了作者本来的用意，他要揭露的是另外的矛盾：要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就应该有“唾面自干”的雅量；你们沉不住气，缺乏雅量，就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这里应该说明：这篇文章是“写于5月21日”的；却是发表在7月15日出版的“新港”上。文责，“新港”编辑部应该负不小的一部分吧！

“論一朝天子一朝臣”也有点“雅量”

我说的是“有点”，所以不论全文。

这篇文章是驳斥“轮流执政”的谬论的。其中有这么一段：

“现在倘若实行‘轮流执政’，我看也很危险。试想，共产党执政时，实行的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实行改造，‘定息’七年；而另一种人执政时，却因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沒有两面性，不要改造，只摘掉他们的资产阶级帽子，而把‘定息’延长为二十年，多多的给贖买金，这也是‘社会主义’；再换一种人执政时，却把‘统购统销’等政策一律取消，专给高级知识分子发弹簧床、转椅，送菜送饭，多多的贡献猪肉，而让工人、农民的生活‘改善’到国民党时候的样子……。”

我看这有点“雅量”，一“雅量”就糊涂。我不是据此就断定作者准是糊涂人，这篇文章全是糊涂文；然而，这段“试

想”却是糊涂得够受了：难道共产党下台，换上“另一种人执政时”，只是不要改造资产阶级，要把定息延長为二十年，多多的給贖买金？而“統購統銷等政策”还不会“一律取消”？“再換一种人执政时”，会給“高級知識分子发彈簧床、轉椅，送菜送飯，多多的貢獻猪肉”？作者也是高級知識分子吧，我看，那时候他未必会輪到“发彈簧床”的。同志！共产党下台，“另一种人执政”，是要千百万人头落地的！难道沒有从葛佩琦之流那里聞到血腥气味嗎？

事有湊巧，这篇文章被排为冠軍，彭鼎的“雅量”被排为亞軍，前者好象在为“雅量”开路。

顧隨的“妙論”

亞軍之后是顧隨的“妙論”。这“妙論”是真“妙”的。

作者說：“妙論”就是謬論；发“妙論”的“妙”人就是“謬人”。典型之一就是儲安平。于是引出了他自己的“妙論”，其文曰：

“一个人在說話（包括写文章）时，出了語病，往往成为‘妙’（謬）論。而思想上有些不对头，往往使一个人成为‘妙’（謬）人。儲安平有着那样的‘妙’論，这就說明了他是一个‘妙’人。”

真是“雅量”大得很！儲安平之类的“謬人”，竟是由于說話“出了語病”、“思想上有些不对头”？皮膚被毒虫叮一口，就要起反应：立刻紅腫起来；那是“雅量”不来的。顧隨先生这么“雅量”，我看是那毒虫沒有叮到他的身上；不然，为什么

会麻木到这般程度？

还有更“妙”的：

章伯鈞把儲安平和胡风一起列为历史人物，“妙論”的作者問道：

“假如章伯鈞說的历史人物是正面的意思，則胡风之反党、反革命、反人民，早已不待盖棺而后論定，他算得是哪一号的历史人物？章伯鈞以儲安平与胡风并列，儲安平又算得哪一号的历史人物？！”

“假如章伯鈞說的历史人物是反面的意思，則在中国如秦檜之为卖国賊，在西洋如希特勒之为法西斯头子，都可以算得历史人物。”

难道章伯鈞的“正”、“反”，跟我們的“正”、“反”一样嗎？作者不知是站在什么立場上，产生了这种疑問的？

作者又問：

“反对共产党領導”、“反对无产階級領導”的妙人“何以不想一想：解放以来，官僚資本主义、地主階級已被消灭得无影无踪；而民族資本主义也在經歷着社会主义改造；全国人民都將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即无产階級。国家的事必須由人民当家作主。倘若反对无产階級領導，那么，將由誰来領導呢？这除了恭請资产階級和資本主义复辟以外，不可能有第二个答案。”

真是糊涂得可以了。右派分子不正是因为共产党、无产階級实行社会主义、消灭資本主义才反对它的嗎？不正是要资产階級上台，恢复資本主义嗎？顧随先生，你“何以不想一

想”？說这是糊涂，也許不确。“何以不想一想”之間，似乎是照应前边“說話时出了語病”、“思想上有些不对头”就成了“謬人”的妙論的。那意思还不是說，章乃器、儲安平之流不过是“說話时出了語病”、“思想上有些不对头”。这在客觀上不是为右派分子开脫嗎？不是反証当前对右派的斗争太不“雅量”了嗎？

余 論

“新港”編輯在“这一期”里說：和右派的斗争，“是一場严重的政治斗争”，“本刊在这一期上发表了一批有关这方面內容的杂文，并不算‘应景文字’。”并說，这“只能算是一个开始”，“希望在今后能看到更多一些能結合当前政治斗争的杂文，做为犀利的投枪，以刺向敌人的喉管。”

这希望是很好的；然而这个“开始”却不算太妙，偏巧被排在头三名的都有問題：第一篇太軟，缺少鋼；第二篇簡直是——怎样說好呢？用作者的話說，簡直是“唾面自干”，不过这也不确，就說是向正在和右派分子进行严肃斗争的战士开玩笑吧！第三篇，犀利倒是犀利，然而严重的問題是“刺向”的“向”，不知編輯是否被刺了一下？

我也同意，这“不算应景文字”。三篇杂文，恰好是表现了反右派斗争中，知識分子的三种典型，所以它們是有保存的价值的，而且，我以为这是值得引起杂文作家們和杂文編輯們的深深思索的。

（写于7月21日）

超階級的友情論，可以休矣！

1957年9月8日“人民日報”三版刊載：宋秀華堅決和她的丈夫、右派分子楊紹謙作鬥爭，她勇敢地、不留情地揭露了楊紹謙的一些陰謀活動和反動言論。可喜，可賀，這是偉大的高貴的感情。這一生動的事實，又一次證明了超階級的友情論的破產。

楊紹謙是宋秀華的丈夫，但是，她明白，更重要的是：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有深情大愛，她堅決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所以夫婦關係並沒有影響她和楊紹謙作鬥爭的勇氣和決心。而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有深仇大恨的楊紹謙，則對他的站在社會主義立場上的妻子宋秀華進行隱瞞和欺騙，把她當做敵人，對她不敢吐露真實情感。由此可見，就是夫婦關係也不能不打上深刻的階級烙印。他和她都把夫婦關係從屬於階級關係，從屬於階級鬥爭。然而，楊紹謙的感情是卑鄙的，他企圖拉着社會倒退，他與廣大人民為敵，他對宋秀華一直是進行欺騙；而宋秀華的感情卻是偉大的高貴的，她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愛人民，愛國家，不為私人關係所蒙蔽。而且，宋秀華對於一直欺騙她的丈夫，也是在進行挽救。是的，堅決鬥爭是真正的挽救；同流合污，只有死路一條。宋秀華警告她的丈夫：“必須徹底交代，不許蒙混

过关，否則只有自絕于人民。”这話是很对的。

宋秀华是一个不知名的“小人物”。偏偏就有一个知名的、自称是“大人物”的馮雪峯出来作陪襯。宋秀华会不会写文章，我不知道；但是她用自己的行动写了一篇正确的“論友爱”；而且恰恰是与馮雪峯的“論友爱”成了鮮明的对照。反党分子馮雪峯論的是什么友爱？他提倡把私人的友情摆在阶级斗争、阶级利益之上，他认为一个朋友“对于民族或社会，或阶级或他們所屬的集团有叛逆或破坏的企图”，如果不先劝告、阻止而向社会或集团告发，这对于朋友和同志都是“居心阴惡”的。馮雪峯告訴我們：私人友情是“至高无上”的，一切都應該服从私人友情，这是多么的“超阶级”啊！然而，生活在地球上畢竟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飞上天，“超阶级”的友情論畢竟还是落在了反动阶级的立場上。馮雪峯的友情論不正是为叛徒說話的“理論”嗎？不正是攻击对党、对工人阶级、对革命事业的忠实同志嗎？而且，他还瞞着党把叛徒拉到党内来，从内部进行破坏呢！

看了宋秀华的“論友爱”和馮雪峯的“論友爱”，我想，出于一时糊涂、失足陷入超阶级的友情論的同志，應該猛省了吧？宣傳超阶级的友情論，是帮誰的忙呢？信奉超阶级的友情論，便按着这种“理論”处人处事，会走到那里去呢？馮雪峯就是前車之鉴。想到这里，應該不寒而慄吧？

反右派斗争是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的学校。平时不容易弄通的問題，在这場尖銳的阶级斗争中，是昭然若揭的了。提出超阶级的友情論的，有的就是右派分子，他們是玩的騙

兪，用以拉攏立場不穩的人，站到右派立場上攻击共产党。而由于立場模糊，思想糊涂，一时陷入超階級的友情論的人，也不自覺地幫了右派的忙，而且在这个問題上，实际上也站到了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去了。至于坚持以超階級的友情論处人处事的人；也就不能不从这一点上越滑越远，以至墮落成右派分子。

客觀事实的邏輯，是最執拗不过的！

超階級的友情論，可以休矣！

（写于9月13日）

論“小罵大幫忙”

在国民党反动統治时代，有所謂对国民党政府“小罵大幫忙”的报纸。这种报纸，很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支持和器重。那个中的秘密勾当，对于一切正直的人们，并不是难理解的。而今天右派分子賞識起“小罵大幫忙”的报纸来了；新社会里没有这样的报纸，簡直是大憾事。他們說：这是新社会里不民主的表现。

对于蒼蝇說来，沒有污点，沒有骯髒东西，是最重大的缺憾；不，岂止是缺憾，那簡直是清潔員們的一項万惡不赦的大罪。我屋子里正有一只蒼蝇乱飞。昨天我爱人回家，收拾了半天屋子，把髒东西一古腦儿扫出去了。这只可憐的蒼蝇好象落不下脚的样子，一个劲的嗡嗡嗡。这定然是罵我們的。由此联想，右派分子抓住一切由头咒罵新社会，原没有什么奇怪；那原因就是为的人们扫除了垃圾。不过，它們和他們却并不嗡嗡一陣算完，重要的是在潔白无瑕的璧玉上拉屎，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拉屎之后接着下蛆，繁殖它們的孽子孽孙。君不見，資产階級右派的新聞人物，在嗡嗡了一陣之后，就曾經把“文汇报”“光明日报”扭到資产階級道路上去，大罵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嗎？而挂的招牌仍曰：“幫忙”——并且是帮助党和政府整风哩！

右派分子之中，有的就是当年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小罵大帮忙”的人物。他們那时干的是什麼勾当，是怎样討得主子的欢心的，他們自个心里是很明白的。而人民也沒有忘記了他們的嘴臉。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处在“山雨欲来风滿楼”的境地，正在搖搖欲墜。書报檢查、查封，以至逮捕、杀头，畢竟压不住人民的反抗呼声。而涂着明显的反动正統臉譜的报纸，作用也是很有限的。在那种情况下，它很需要一种摆出不偏不倚的中正面孔的报纸，为它帮忙。然而，国民党反动政府早已是臭气熏天的东西了。要摆不偏不倚的中正面孔，要取得欺騙人民的資本，就不得不对它罵兩句。反动派愿意挨兩句罵，因为它懂得不叫奴才罵兩句，在大关节目上就帮不了忙。这也算得是“賊人賊智”。于是，“小罵大帮忙”的报纸应运而生矣！这种报纸，是反动派的一种特殊的獵犬，当众向它主人的影子吠兩声，为的是麻痹人民，以便抽冷子着着实实地咬人民的。当年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小罵大帮忙”的人物，如果轉变了立場，或者正在誠心誠意的进行改造，愿意給人民做事，人民是欢迎的、不念旧惡的。而右派分子却拾起“小罵大帮忙”的由头，兴风作浪。他們說：我要帮党和政府的忙，所以要罵；于是就戴着“帮忙”的假面，破口大罵起来了。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光荣的、正确的、偉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正义的。絕大多数人是拥护党和人民政府，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仇恨它的只有一小撮人——反革命分子，还有右派分子。他們是过街的老鼠，是“千夫所指”的对象。

和一切社会渣滓作斗争，需要的是分明的阶级立场，义正辞严的社会主义的鲜明旗帜。千需要，万需要，就是绝对不需要欺骗。有谁会糊涂到这一步田地：要帮党和人民政府的忙，非得骂它一通？没有，实在没有这种人；扯起对党和人民政府“小骂大帮忙”旗子的右派分子，也并不是这种人。扯起这个旗子干什么，他们心里是雪亮的。

当年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小骂大帮忙”的报纸，其骂是欺骗群众的手段，“大帮忙”是目的。如今右派分子叫喊对党和人民政府“小骂大帮忙”，恰好倒了过来，其“帮忙”的招牌是欺骗群众的手段，其“骂”是目的——不过不是最终目的，他们是利用这种手段来起哄，闹匈牙利事件，梦想推翻党和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使资本主义复辟的。

（写于9月2日）



論報紙的“趣味性”

右派分子污蔑黨報，淨是八股、教條，沒有趣味；於是他們大談起報紙的“趣味性”來了，似乎“趣味性”成了辦報的第一原則。我們應該剝開皮來看看：他們所說的“趣味”是什麼？在他們的“趣味性”議論的背后，隱藏着什麼陰謀？

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報紙，辦得生動活潑，文情并茂，能夠引人入勝，引起廣大讀者的興味，好不好？好，我們不但不反對，而且還要努力爭取。但是，它是從屬的，而且它必須也一定從屬於黨性、政治性。對於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報紙說來，必須是黨性（無產階級的黨性）第一，政治（社會主義政治）性第一。而右派分子反對的正是這個：無產階級的黨性、社會主義的政治性。在右派分子眼中看來，這就是教條，就是八股。他們要求把黨報改造成“言不及義”（社會主義）的報紙，變成茶余酒後的消遣品，“小擺設”。

其次，要問是何種趣味？什麼人們的趣味？

有人愛吃酸，有人愛吃甜，有人喜歡吃淡淡的南方菜，有人喜歡吃口重的北方菜，這是人們的胃口的“趣味”不同，這沒有階級性。可是，在階級社會里，一涉及社會事物的新聞、論文、小品，不同階級的人，觀感便不同了。譬如說吧，一篇寫得很有“風趣”的關於“八月中秋吃月餅”的小品，

你讀起来会不会发生兴味？——您怎么答复这个问题，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不从内容着眼，就无从答复。右派先生們，假若这篇小品是发抒所謂“今不如昔”的感慨的，就是你对什么“中秋”呀，吃月餅呀，并不发生兴趣，讀起来也会覺得滿有趣味吧！而在人民看来却是臭不可聞的垃圾。由此可見，什么人对于什么事发生兴趣，从根本上說来是由阶级性决定的。右派先生們，总不会对揭露右派丑态的新聞、小品，发生兴趣的；而且，这样的新聞、小品越是写得生动，你們不越是恨之入骨嗎？

而且“趣味性”也有多种多样：有启发人思考，引人走正路的“趣味性”，有迷惑人，引人走邪路的“趣味性”；有高贵感情的“趣味性”，有黄色肉麻的“趣味性”；有反映真实，鼓励人向上的“趣味性”，也有聳人听闻，制造謠言，挑撥是非的“趣味性”……。趣味性者，使讀者讀之发生兴趣也。然而，使讀者走到那里去，誘发他們发展什么兴趣，則是可以完全不同的。在我們眼前就有根本不同的两种：一种可以“人民日报”为代表，它有坚定的党性（无产阶级的）和政治性（社会主义的），又有服从这种党性和政治性的高尚的趣味性；另一种可以前几个月的“文汇报”为代表，它就有我們前边所說的后一种“趣味性”，而且还濃厚得很哩，花样也多得很多哩！当然，它也有“坚定”（即頑固也）的资产阶级的党性、政治性；不过这一套不兴时了，吃不开了，所以必須乔裝改扮，妖声妖气，迷惑路人。如前一时期的“文汇报”之追求“趣味性”，乃画皮鬼“画皮”之类也。画皮鬼高唱“画皮”第

一，然而，实际上还是吃掉“書生”第一。

右派分子的新聞人物之報紙“趣味性”的議論，是妄想誣蔑黨報，誘使讀者脫離政治，追求低級趣味。——正告右派分子，你們的畫皮伎倆，我們是絕對不需要的；你們認為“枯燥”的，我們的興味大得很呢！

事實教訓了我們：黨性第一、政治性第一，離開黨性、政治性的報紙“趣味性”，是絕對沒有的。

（寫于9月12日）

論“一邊倒”

右派分子誣蔑我們的黨報不真實；他們說：新聞是“組織出來”的，言論是“清一色”的，并概括為三個字曰：“一邊倒”。他們講得振振有詞；其實，這種謾言，揭穿了不值半文錢。

先說“組織出來”的：“新聞”沒有腿，它自己不會跑上“電訊”或報紙的版面；得有記者去採訪，并通過記者的大腦思索，用手把它寫出來。這也就有了“組織”。而且，中國這麼大——就慢說全世界了——，人口這麼多，每天人們所說所做，多得難以計算；若是有聞必錄，得幾百萬、幾千萬張印刷紙容得下？“有聞必錄”不行，得有選擇，這就又“組織”了一下子。若說“人咬狗是新聞，狗咬人不是新聞”呢？這就不但是要“組織”，而且有了選擇，“組織”的標準、原則（我們這裡不說這條原則本身如何）。再說，新聞稿送到報紙編輯的辦公桌上，編輯還得有選擇；而且選擇出來以後還要擬標題，而且標題擬就之後還得選擇標題字的字體，還得拼版……，這又“組織”了一番。右派分子的新聞人物，難道是要求“新聞”自己跑到報紙版面上去，讓它們各自去占領頭條新聞或是末條新聞的陣地嗎？這是笑話。不過，右派分子並不是鬧笑話，那是陰謀。他們是以“客觀主義”作幌子，來誣蔑黨

報的真實性，妄想使人們不相信它。其實，他們反對的並不是“組織出來”的，而是反對的我們的“組織法”——寫新聞、編新聞、擬標題、排版等等的党性（無產階級的党性）原則和實事求是的路綫。右派分子的新聞人物擺出“客觀主義”的面孔，其實也有他們的“組織”新聞的原則，簡言之就是：從太陽里找黑痣，把太陽說成黑的；道聽塗說、捕風捉影、聳人聽聞、製造謠言，顛倒黑白。前幾個月的“文匯報”就是實行這種新聞“組織法”的。資產階級的“客觀主義”是虛偽的、騙人的；新聞、報紙、記者、編輯，都有一定階級的階級性和階級立場。無產階級的新聞和報紙，所遵循的原則是無產階級的党性原則，所遵循的路綫是實事求是的路綫。因為無產階級的党性是和客觀真理完全一致的，實事求是的路綫是科學的路綫，所以按照這種原則和路綫“組織出來”的新聞，才能反映客觀事物的本質，保證新聞的真實性。而資產階級右派提倡的是新聞的資產階級党性原則，純粹主觀主義的路綫。因為資產階級的党性原則，現時已經和客觀真理完全抵觸、背道而馳，主觀主義的路綫是非科學的；所以按照這種原則和路綫“組織出來”的新聞，就定然是歪曲事實，顛倒黑白。而這，也正是他們的目的。

再說“清一色”。如果不把右派分子的謬論包括在內，我們報紙的言論，在大的政治方向上，確是可以算得“清一色”，這是社會主義的一色，真理的一色。我們說，好得很！右派先生們不舒服，這又有什麼辦法呢？在我們的國家里，大多數人就是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嘛！人民民主專政就是

不能給反革命分子以言論自由嘛！当然，在我們自己人內部也有爭論，必要時也要拿到報紙上去爭論；科學研究更是要自由爭論。可是，在右派分子看來，這種爭論不算數，沒有超出社會主義的範圍，沒有大的政治方向上的敵對，豈不是“清一色”！右派分子要的是反動言論和社會主義言論的“平分秋色”，然後再進到反動言論的“黑一色”。這是夢想，辦不到的。我們就是要社會主義的政治言論的“清一色”，真理的“清一色”。現時，這一點我們做得還不太夠，還要努力爭取呢！

右派分子的三個字的概括——“一邊倒”，倒是對的。我們的報紙就是要倒向真理，倒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倒向和平；堅決反對荒謬，反對資本主義，反對戰爭。右派分子倒向那里去呢？事實已經作了結論。右派分子的新聞“客觀主義”論，倒向那里去呢？前幾個月的“文匯報”、“光明日報”也作出了證明。

新聞、報紙的“客觀主義”論，應該休矣！無產階級的党性原則和實事求是的新聞“組織法”才是新聞真實性的根本保證。倒向真理，倒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倒向和平的報紙萬歲！從右派分子的攻擊中，我們倒是應該檢查下：這種“一邊倒”，倒得夠不夠！

（寫於9月12日）

批判費孝通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气”

正是盛夏时节：风調雨順，除草工作正在順利进行，稻禾正在茁壯地生長；眼看就快要进入收获的季节了。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喜悅。但是，人們並沒有忘記在今年的“不平常的春天”里，右派謀士費孝通发出的向人民襲击的寒流——“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气”。那是右派摧殘鮮花的狂风暴雨即將到来的信号；是暗害人心的寒流。邪不能压正，妄图遮沒太阳的烏云已經到了他應該到的地方去了；而今已是晴空万里，太阳高照。但是，在寒流襲来的时候，有些知識分子却受了感冒，一度发着高烧，講了許多胡話；而且至今有的人还没有退烧。因此，对“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气”进行一番剖析，也还是必要的。

費孝通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气”，是极其隱晦曲折的。但是，狐狸总是有尾巴的；而既有尾巴，也总是掩藏不住的。

“牆外行人”——陰險的挑撥

費孝通摆出懂得知識分子的心理，替知識分子說話、伸張“正义”的姿态，对知識分子同党的关系进行陰險、惡毒的挑撥。

“前年年底，我會到南京、蘇州、杭州去走過一趟。一路上也會到不少老朋友，在他們談吐之間，令人感覺到有一種寂寞之感：當一個人碰到一樁心愛的事而自己卻又覺得沒有份的時候，心里油然而生的那種無可奈何的意味。這些老知識分子當他們搞清楚瞭社會主義是什麼的時候，他們是傾心嚮往的。但是未免發覺得遲了一步，似乎前進的隊伍里已沒有他們的地位，心上怎能不浮起了牆外行人的‘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却被無情惱’的感嘆。”

對知識分子裝出了一副笑臉，一副媚態：“你們是‘正義’的，搞清楚瞭社會主義是什麼，就傾心嚮往，就毫不憂疑地為它的實現而奮鬥！”——這麼說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不是多此一舉嗎？他們原本是念一遍社會主義的書，弄清“社會主義是什麼”，就是社會主義的忠誠戰士了。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豈不是完全錯誤的？但事實告訴我們：除了無產階級以外的人，並不是“搞清楚瞭社會主義是什麼”，就傾心嚮往，就全心全意地獻身社會主義事業，為它的實現而奮鬥的。其中有不少的人，還有憂疑，還三心二意，還要觀望，還要“自外”，……惟其如此，所以必須進行嚴重的思想改造。而且，其中還有一種人，越是搞清楚瞭“社會主義是什麼”，就越是堅決地反對社會主義。費孝通之流不就是這類知識分子嗎？他們清楚社會主義是徹底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是要對反對社會主義的分子實行專政，決不實行資產階級的兩院制；他們清楚，社會主義革命在中國竟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惟其清楚了這一些，才更堅決地反對它，刻不容緩地起來進行反對社會主義、使資本主義復辟的鬥爭。

他們要进行这种斗争，所以要“招兵买马”，首先是在知识分子中间“招兵买马”：“知识分子们，我的朋友啊！你这么热心，但你们发觉社会主义‘发觉得迟了一步’，共产党把你们当作‘墙外行人’看待的，‘好事情’没有你们的份啊！”——这就是这段妙文的实质。他恶毒地攻击共产党排斥党外知识分子，共产党是一个大宗派，竟不准发觉社会主义“发觉得迟了一步”的知识分子，参加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行列中来！这是多么阴险、恶毒！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难道不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除了费孝通之流的广大知识分子，难道不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步了，做了许多有益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工作？从总的方面说来，难道他们不正是日益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日益明确地向社会主义目标前进？

不愧是谋士！费孝通确是摸着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他发现了某些知识分子虽是开始或即将进入社会主义的行列，但是，却还有或多或少的“自外”思想。于是就发出了诱惑性的“墙外行人”这个糖衣炮弹。结果就有一些具有“自外”思想的知识分子受了感染，生了病，发开了烧。

“自外”思想是一点也要不得的。这是我们应该接受的教训。

污蔑“向科学进军”，暗示党不能领导科学

但是，那时候毕竟还是右派分子的“早春天气”；恶毒地攻击不能太露骨了。费孝通在“墙外行人”的恶毒议论之后，接着说，那是一年多以前的情况，“一年多以前知识分子苦

惱的是有力使不上；一年来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于是笔尖一轉，就要咒罵現在了。

所謂“基本解决”，据費孝通說：也不过是改善了知識分子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而“兩者比較起来，生活条件似乎改善得更多一些”。在这里暗伏了“知識分子，只是讓他吃得好、穿得好，还是要造反”的引綫。不过，那时因为“气候”的关系，費孝通沒敢公开地这么說。他只是說知識分子苦悶，做科学研究的心愿不能实现。費孝通惡毒地进行污蔑，說这是淵源于教学改革和思想改造，而失望于“向科学进军”的。

他伪装同情知識分子“靜靜地做功課”的心愿，輕輕的几笔否定了教学改革和思想改造：

“在教学改革初期，教师們曾經紧张过一陣。那是由于要学习苏联，很多教材都要新編，又由于經過思想改造运动，許多教师們把原来学来的一套否定了，而新的体系沒有建立，有些青黄不接。……但是上課的困难似乎确是比較少了。那是因为一方面教师已有所提高（这是掩盖狐狸尾巴的伎倆——引者注），另一方面講义也編出了一套，上堂照本宣讀，問題已不大（狐狸尾巴終于露出来了——引者注）。

請問費孝通：“学习苏联”，“新編”教材算不算“靜靜地做功課”，算不算科学研究？思想改造否定了那一套呢？难道不是資產階級那一套，尤其是費孝通的专业——反动的資產階級社会学嗎？我們認為这是應該否定，必須否定的。是什么和什么的“青黄不接”呢？难道我們对各門自然科学的知識已經全盤廢棄，要人們在廢墟上另建新的体系？难道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是不成体系的？費孝通實質上是污蔑“学

习苏联”、教学改革、思想改造是教条主义的，所得到的只是空虚，“照本宣读”！

费孝通的眼睛是“向前看”的。污蔑过去，是为的绞杀现在，创造他们的将来。

据说知识分子们现在可以做做科学研究了。但又碰上了倒楣的“向科学进军”，碰上了一定要领导科学的“外行”们的捣乱：

“有些学校（要盖尾巴，这里只好用“有些”两字了——引者注）把‘向科学进军’当运动来搞，做了号召性的动员报告之后，发表格要教师们填题目，造计划，甚至过了一个时候就伸手要成果（你看，这是外行得多么可笑啊！——引者释）。……我就遇到过已经填过几次科学研究计划表的朋友，见了我还是说科学研究方向不明，题目难找，甚至有些连自己在表上填过些什么都不大清楚了。对于这些朋友，向科学进军真象一阵风，只‘吹皱了一池春水’（向科学进军的计划，真是胡闹！——引者释）。另外还有些朋友，急于赶世界水平，对实际条件考虑不够，一动手首先和已有的教学任务碰了头，时间冲突，精力兼顾不来，发生了矛盾。我又注意到有一些学校领导上对第一种情况倒并不焦急，按兵不动，但求完得成当前教学任务就满意了，而且科学研究表格已汇报了上级，交了卷了（只有刮阵风“吹皱一池春水”的本领的领导者们，只会这么干！——引者释）。他们对于第二种情况却相当敏感，惟恐教学任务受到影响。他们不去分析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更少自觉到这正是缺乏具体领导的结果；反而大叫教学和科学研究有矛盾，教师们名利心重，轻教重研。好象为按兵不动，填表了事，找到了正当理由。”

够了，不必再抄引了，已經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費孝通是在污蔑党和国家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和科学研究计划的制定；是在污蔑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的领导人；暗示共产党对于科学是外行兼胡闹，是不能领导科学的，知识分子们要向科学进军，得另找领导者。費孝通之流，对这件事当然是“当仁不让”的。那时候他还不肯明说，但却也够恶毒的；他说了他的解决研究和教学矛盾的天才发明：“不是在冻结科学研究、保证教学，而是在加强对科学研究的具体领导，密切和教学的结合。”你看，这末一条常识，领导科学研究和高等学校的领导者们竟不懂得，竟还得費孝通重新“发明”一次；而且这些领导人是这么拒常识于千里之外，以致費孝通说出这个常识的时候，还得吞吞吐吐，附加上“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研究”，只是“总觉得”。你看，大学里的领导者们竟是这样难以理喻。怎么办？赶快夹了夹尾巴：你们自己去得结论吧！你们会得出：……（必须把这些“外行”赶下台去）。

很明显，这是夺取高等学校的领导权、另起炉灶制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之张本。这是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出场前的锣鼓，烟幕弹。

这里还得称赞費孝通不愧为谋士。他抓着了在某些学校还没有很好解决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的矛盾，大做文章。他摸着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心理：重研轻教、重业务轻政治，忽视马克思主义对于科学研究的指导意义。他们不满意批判重研轻教、重业务轻政治的倾向，他们不满意强调以马克思主义

作为科学研究的指导方针。于是他们就上了当，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費孝通輩设计的政治圈套。这是我們应该接受的又一教训。

“紅臉和白臉”——惡毒的污蔑馬列主义教育

費孝通“接着想談談百家爭鳴”了。但是，大概是他覺得污蔑过去做得不够，还不足以絞杀現在，創造“將來”；所以在談百家爭鳴的由头下，更惡毒地污蔑党对知識分子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百家爭鳴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立場这一关改起的。划清敌我似乎比較容易些，一到观点、方法，就发生唯心和唯物的問題，似乎就不簡單了。比如說，拥护党、政府，愛国家、人民，对知識分子來說是容易搞得通的，但是要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就有不少人弄不大清楚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心的那一套。唯物和唯心的界綫弄不大清楚，只有簡單地划一下，說凡是資產階級国家里講的学术都是唯心的，凡是社会主义国家里講的学术都是唯物的。如果这条綫划对了，事情是容易办些。英美的書本占書架，当廢紙卖掉；俄文來不及学，就买翻譯的小冊子來讀。写文章、上講堂多引几句引經据典的話，找几个英美学者罵上一番。这些都好办，而且很多人是这样办了。……有一点象小孩子看草台戏，剧情看不懂，就看白臉还是紅臉，白臉挨打了就叫好。……”

很明显，他是在污蔑：共产党搞的宣傳辯証唯物主义、批判資產階級的唯心主义，是胡鬧，是小孩子的儿戏。对偉大的

事物进行污蔑只有造謠，而造謠就顧不得普通人的常識了。有誰說过“凡是資產階級国家里講的學朮都是唯心的，凡是社会主义国家里講的學朮都是唯物的”話呢？除了費孝通之流給別人臉上涂白粉的捏造，我們的學者，有誰是按着这条“原則”办事的呢？費孝通自己的原則倒是这样：凡是社会主义国家里講的學朮都是教条主义的；凡是資本主义国家里講的學朮都是真理，——不过不包括馬克思主义者講的东西，因为那算不得“學朮”。几年来我們对辯証唯物主义的宣傳，对資產階級唯心主义的批判，还做得不够深入，还有簡單化的偏向；但却是有巨大成績的，在广大知識分子中进行了馬列主义哲学的启蒙教育，使得他們初步划清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这是我們繼續前进的基础；是不能容忍右派分子把它丑化的。曾經有位先生为唯心主义哲学爭取更高的評价，反对“唯心主义哲学是錯誤的”这个科学判断，譏諷青年哲学工作者說：簡單得象小孩子看戏一样，紅臉是好人，白臉是坏人。簡單倒是簡單，但是他們的看法基本上沒有錯。我們應該感謝前人創造了“臉譜”，只要看了出場人物的那張大白臉，就知道他是一個坏蛋，虽然还不曉得他的具体性格；但有了这么一点常識，仔細看去就不会上当。“唯心主义哲学是錯誤的”，虽然簡單，但却是最簡單的真理，有了这么一点“常識”，去分析批判唯心主义的各个流派，就能避免上当。小孩子也会反問大人：“你为什么复杂得連紅臉和白臉也分不清呢？”——費孝通就是从这里拾来了“紅臉、白臉”的由头；不过他更进一步丑化了所謂“簡單化”。我們可以告訴費孝通，

我們有一條簡單的真理：在政治上，現今帝國主義陣營就是白臉，社會主義陣營就是紅臉，在我們國家右派分子就是白臉，左派就是紅臉；在哲學上，現代反動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就是白臉，辯證唯物主義就是紅臉。我說的是够簡單的了。因為我知道費孝通並不是反對的什麼簡單化，而是反對的“白臉挨了打就叫好”。我們是決意要為“紅臉”的勝利叫好的；費孝通你到應該找的地方去找“白臉”的啦啦隊吧！

據費孝通說：“紅臉、白臉”的簡單化做法至今不衰。知識分子前進了，他們要求把唯物唯心的問題搞清楚，但“別人還是紅臉白臉地對付他”，這樣會把積極的東西變成消極的東西。怎麼辦？這只有把“不學無術”的領導者趕下台去，由費孝通等人去領導科學和哲學。給歷史上的白臉翻了案，現今政治舞台上的白臉就會博得掌聲了。

費孝通污蔑了黨對知識分子的馬列主義教育，也污蔑了知識分子。但是，為什麼還有少數知識分子受了迷惑呢？這又不得不佩服謀士的“高明”了。有些知識分子把思想改造，立場轉變看得太容易，或把自己估計過高，以為自己用不着什麼嚴重的改造。於是，費孝通抓着這種“心理狀態”對知識分子獻媚了；知識分子解決立場問題，划清敵我是容易的啊！你們已經改造得很好了啊，以後應該（或早就應該）單純搞學術了，可是有人還要麻煩你們，要你們改造思想！有些知識分子還自覺不自覺的留戀資產階級的一套思想體系，以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去理解“百家爭鳴”。於是，費孝通就抓着這種“心理狀態”，污蔑馬列主義原則（把它歪曲，把它

丑化)，污蔑党对知識分子的馬列主义教育。有些人就这样上了当。这是我們應該接受的又一教訓。

污蔑学术思想批判，散播对党的 “百家爭鳴”方針的不信任情緒

費孝通說，“百家爭鳴”的方針，貫徹得比“向科学进军”还差一些。“向科学进军”，已經是搞得够“糟”的了；“百家爭鳴”岂不是搞得更“糟”。費孝通是善于从描写所謂知識分子的心理状态，烘托“黑暗”的。接着他就談知識分子的“顧慮”問題了。

他說，知識分子顧慮的是面子，怕出丑。这还不对嗎！然而在“面子”的背后是掩藏着陰謀的。他惡毒地說：

“我記得有一次座談会上有一位朋友說得很生动，他說，我不是怕挨批評，我們以前还不是大家有被批評的，学朮論战还是搞过，現在可挨不得，因为一有人說自己有了唯心主义，明天上課学生的臉色就不同，自己脚也軟了。面子是很現实的东西。帶上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打入冷宮，一直会影响到物質基础，因为这是‘德’，評級評薪，进修出国，甚至談恋爱，找爱人都受到影响。……”

这是多么惡毒啊！他把我們国家，党領導下的学朮批判，說成是“起哄”，描写成那样阴森可怕，而且已經是成了社会风气，要改也是“积重难返”的。这是对党的咒罵，对新社会的污辱。这咒罵和污辱，是为的挑起知識分子对党的百家爭鳴方針的不信任：別看共产党提倡百家爭鳴，他們懂得什么学朮呢！过去的所謂“学朮批判”是起哄，阴森可怕的，并且这

对于共产党是“积重难返”的啊！并且，现在还有大叫：“唯心主义泛滥了”，“资产阶级思想又冒头了”。——费孝通用讽刺的口气把这说法叫作“警钟”；是的，是警钟，费孝通之流利用百家争鸣恢复资产阶级的一套，是必须批判的。——怎么办？那隐藏着的答案就是：“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好的，但是，得换上另一种人掌权才能行得通。

有些知识分子抱着自由主义的态度对待百家争鸣，他们害怕“学朮批判”，但又觉得这种“害怕”是和学者的身分不相容的。这也可以说是他们的一种内心矛盾。于是费孝通就出来为他们解脱了：你们是大科学家、大学者，当然是不怕学朮批判的；只是共产党搞的“学朮批判”胡闹，才怕了起来。有些人就这样上了当，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事，也看不清了。这也是我们应该接受的教训。

杀气腾腾的政治煽动

费孝通大谈“科学”，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热心的是政治，是代表他的阶级夺取领导权的。从上面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但是，费孝通却觉得那还太不够；在这篇文章的最末一段就更露骨地进行政治煽动了。他说：知识分子对“和实际政治关系密切的问题，大多更是守口如瓶，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神气。”他十分遗憾的是：匈牙利事件在我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引起的波动却是不大的。”然而，这位野心家，经过对这个情形的分析，却引出了希望。他分析说：

“一方面这是好的，說明我們的这些知識分子立場是穩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仔細了解一下，可以看到他們并不是思想上是非辨別得很清楚所以很穩，而是沒有深刻地动过腦筋，古井沒有生波，不很关心。”

“一方面”、“另一方面”，难道还不全面嗎？然而，这里使的是江湖騙術。那“穩”的一面不过是表面假象，而“仔細了解”了一下，却是他們“沒有深刻地动过腦筋”。若是有人启发他們“动一下”啊，那就可以造起反来了。于是費孝通信心倍增了，于是就刮起狂风来使“古井生波”了。

他一方面用激將法，激那些他認為可以“生波”而沒有“生波”的知識分子；一方面尽情污蔑我們国家的政治生活。他把知識分子說成是完全不关心国家大事的，簡直是一块呆木头。这是激將法。激起来干什么？費孝通裝模作样的写道：

“我們曾經想替这些思想配个帽子，但是配来配去头寸都不很合。說信任党、接受領導不对么？当然不可以这样說。但是怎么会信任得成了依賴了呢？虛心些也是好的，但是怎么搞得沒有了主張了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思想情况呢？这些思想情况又說明什么呢？……”

問題的提法就隱含了答案。但是，他当时还不敢太露骨的说。挖空心思，挤出了妙語：

“我們似乎觉得这里是不是反映着这些知識分子觉得問不問国事对国家对己都沒有什么区别呢？自己有个主張和沒有个主張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他們觉得积极来提出意見似乎也沒有什么必要，別人也不見得考虑，不贊一詞，国家的事还是办得很好呢？”

这一段真是有“画龙点睛”之妙。說来說去，归結到一句：“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生活”。他用了几句“是不是”，把我国政治制度描写成共产党独裁，沒有絲毫民主，以致高級知識分子全成了麻木不仁的阿斗。后来，他在“早春前后”一文中說，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揭所謂“第二个盖子”的。“这个盖子一揭开，开出来的是知識分子对政治的积极性”。按着他的阴阳八卦，那积极性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的积极性，用資本主义原則改变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性。更妥帖一点說：这“揭盖子”的文章，是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前奏曲，进军号；“招兵买馬”的誘餌。

最后，他得意地、意味深長地說：“那么怎样把他們在这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呢？——說到了这些問題，我想可能会超过我这篇杂文的范围。那是春暖花开时节的事。”

右派分子开的是什麼“花”，我們已經領教过了。现在是盛夏时节，风調雨順，剷除毒草的工作正在順利进行，稻禾正在茁壯的生長；眼看就要到收获的季节了。人們欢欣鼓舞。經一事，長一智；人們在剷除毒草的时候，也正在吸收經驗和教訓。总的說一句，我認为是：“心怀个人主义家中坐，牛鬼蛇神叩門来。”讓我們自己更健康起来，更有力地和牛鬼蛇神斗争吧！这是政治的积极性，社会主义的政治积极性。

（写于8月7日）

“不通”和陰謀

——斥吳景超的“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嗎？”

我們都看到过一些不通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多半是因为沒有想通，或是因为文化水平低、表达能力差，愿意文章通而沒有写通。但是，另外还有一种不通的文章，却是作者不愿意通，故意的不通，并且是千方百計、費尽心机使它不通。因为“不通”，可以包藏政治陰謀，欺騙羣众；可以預留下在被抓住狐狸尾巴时进行狡辯的口实。这是在人民的天下，在无产阶级專政的条件下，写反共、反人民的文章之最“上乘”的作法。吳景超的“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嗎？”，就是这种文章的一个典型；真是該入“右派文选”的。我們要領教一下这篇文章的“妙处”。

奇異的開場鑼鼓

吳景超这篇文章的開場鑼鼓，是这样打的：

“1956年10月19日的‘真理报’上，登載了一篇苏联科学院通信院士費多塞也夫所写的一篇文章，报导关于国际社会学学会第三次會議的情况。……文章中除敘述了在會議中馬克思主义者与非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斗爭以外，在文章的末尾，特別指出一点，就是西方国家的社会学者，发表了大量的关于劳动、文化、生活、家庭、道德、都市与乡村等問題

的文献，但是这些材料，在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中，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社会科学工作者沒有对于它們进行分析与批判。这一缺点，应当很快地加以矯正。”

按照我們的常識，演京剧打完了“急急风”的鑼鼓点，是要出武生的；然而，这一回出来的却是扭扭怩怩的彩旦。

看来吳景超是說受到費多塞也夫同志的文章的启发的。按照正常的邏輯、文章作法，那么在打完了这通開場鑼鼓——敘述費多塞也夫的文章之后，接下去該是談在我們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怎样重視西方国家社会学者发表的文献，对它进行分析与批判了。然而，吳景超的文章接下去却是：“这一切，使我想起中国的社会学往何处去的问题”；于是就談起“恢复”社会学来了。奇怪！費多塞也夫的文章說，对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分析批判不够，这一缺点应当很快地加以矯正（据你吳景超的敘述），怎么使你吳景超“想到中国的社会学往何处去的问题”呢？怎么使你想到“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嗎”这个问题呢？費多塞也夫的文章，怎么能引起你吳景超要“恢复”社会学的动机呢？費多塞也夫的意思，是要加强对社会学的批判；你吳景超的大文是要“恢复”社会学。这兩者沒有任何邏輯联系，这兩者是“风牛馬不相及”的。为什么把費多塞也夫的文章拉来，打开場鑼鼓？我想，如果讓一位不問政治的中学国文教員，当作学生作文来批改，在这里一定批曰：“下文不接上文”，或“駢唇不对馬嘴”。然而，吳景超的文章之“妙”，也就“妙”在这里。

打这一通奇異的開場鑼鼓，是煞費苦心的。其目的，无

非是要給讀者这样一种印象：吳景超談社会学这个問題，是偶然想到的，是受了費多塞也夫的文章的启发才想到的，这篇文章可沒有“別的”意思。难道这不是“賊人心虛”、“此地无銀三十兩”嗎？誰說过不准談社会学呢？沒有誰說过。吳景超等右派分子，“恢复”社会学的活动包藏着政治陰謀，要篡改国家的指导思想，是章罗联盟反动政治陰謀的一个組成部分；所以就不能不心虛了。于是就不顧邏輯，硬抓住費多塞也夫的文章，作为他发起和公开談“恢复”社会学的由头。

这通開場鑼鼓，还有一个“妙”处：“……这些材料，在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沒有受到足够的重視（着重点是引者加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沒有对于它們进行分析与批判”；妙就妙在这里“重視”这个字眼，含义是模糊的，可以使人发生歧解。重視什么？是把西方国家的社会学作为一門真正具有科学价值的学問来重視嗎？是象吳景超一样主張恢复反动的社会学嗎？費多塞也夫的文章，当然不是这样的意思。按吳景超的敘述的上下文看来，也应理解为：費多塞也夫是主張重視西方国家社会学者发表的“文献”，进行分析批判，根据现代資产階級社会学的特点，和它进行斗争。但是，他却故意說得含混不清，以便使人（特别是过去搞社会学的，不明社会学底細的）理解为：苏联、費多塞也夫也重視起社会学本身的“价值”来了，可見社会学还是有用的。并且，这还可以留下被抓住狐狸尾巴时进行狡辯的口实。

果然，吳景超在“交代”（在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举办的座談会上的交代，下同）时，就利用上这通奇異的开

場鑼鼓了。他說：“去年10月19日在真理報上看見費多塞也夫的一篇文章，……提到西方社會學界發表了文化、勞動、家庭、道德、生活的文章，但是在蘇聯及人民民主國家，並未重視，我們應該作這方面的工作，這對我啟發很大。我覺得蘇聯也注重西方社會學了。這是外因。”真是狡滑！這裡關於“分析批判”一字不提了，只剩下“重視”兩個字。重視什麼？是重視對西方社會學的分析批判，還是重視它有什麼“科學”價值？他故意不說清楚，玩弄“重視”、“注重”這樣的字眼，企圖給人造成一種印象：蘇聯、費多塞也夫是主張恢復社會學的，吳景超倒是學習蘇聯。這是造謠，給費多塞也夫同志栽贓。他說，費多塞也夫的文章是他要“恢復”社會學的外因。狡辯也應該有個限度吧？費多塞也夫主張重視對西方社會學的批判，怎麼能成了你吳景超要“恢復”社會學的外因？怎麼能刺激起你“恢復”社會學的動機？現在，吳景超必須向人民交代，你們“恢復”資產階級反動社會學的政治動機。事實已經表明，所謂“恢復”社會學的活動完全是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陰謀的一部分。用偶然的動機，用跟你們根本不相干的費多塞也夫同志的文章，來推托罪責是辦不到的。⁴²

巧妙的“安排”

我們再看開場鑼鼓之後的正文。吳景超的“正文”是從1952年院系調整取消社會學系開始的。對這件事是贊成還是反對？他扭扭捏捏地不正面表示態度，而這樣寫道：

“社會學系都一概取消了。過去搞社會學的人，大部分

都改业了。当然这不等于說，过去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現在沒有人研究了。不是这样的。社会学的某些部分，如劳动問題、民族問題，在我們的高等学校中，現在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这是掩盖狐狸尾巴的詭計——引者注）。但是也有些部分現在还未得到适当的安排”（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煞費苦心所寻找的“安排”这个詞儿真是妙啊！这个詞儿，在这里可以掩盖劍拔弩張的进攻，可以使某些人嗅觉迟頓起来。接下去就談他“对于这些部分”的“安排”意見了。那些部分？首先是社会学原理，應該在我国的哲学系中开課，据說这可以“丰富历史唯物論”。再就是所謂“应用社会学”，他开出了八种（或十种）科目（人口理論及統計，社会調查〔都市社会学与乡村社会学都可并入社会調查之內〕，婚姻、家庭、妇女、儿童等問題，社会病态中的犯罪学），說都要并入其他学院有关各系之內开課。“理論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的八种科目都應該在大学开課，岂不是1952年取消社会学系完全錯了么？吳景超为什么不“打开窗子說亮話”？他在这里还玩弄了这样一个阴謀：把人口理論、統計、社会調查、婚姻、家庭……等八种社会問題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說成是资产階級社会学的“独家經營”，而“別无分号”的，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是不研究这些、也不懂这些問題的；而1952年的“院系調整”却把这些“安排”掉了，現在沒有人研究这些問題了，唯一懂这些問題、会研究这些問題的——过去搞社会学的人，被“院系調整”調整得改业了。这是顛倒黑白的造謠；这是企图挑撥过去搞社会学的人对党和国家的关系，挑起他們

对党和国家的不満。誰不知道：吳景超所說的那八种社会現象，是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过，資产階級社会学“研究”这些对象是用反动观点和方法，其目的是欺騙羣众，为資产階級的反动政治服务；而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是用无产階級的立場、观点和方法去研究这些問題，发现客观規律，为革命、为人民羣众服务。不但从理論上說来是如此，而且實踐上，我国开国八年以来，若干理論工作者和国家机关、实际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对这些問題进行了艰苦細致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而吳景超之流在这些方面做了些什么呢？不就是費孝通的造謠挑撥、向党向社会主义惡毒进攻的“重訪江村”之类的东西嗎？

鉄的事实，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在文章的結尾，我們又遇到了一段妙文：

“旧社会学还有其他一些部分……（即前边所引的八种科目，这里从略），都可酌量并入其他学院有关各系之内。開設这些課程，当然不能采用旧的課本，講授时也不能采取旧的立場观点与方法。但是以历史唯物論的知識为基础，来研究这些問題，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設，也还是有用的。”

这三句話，怎么能联在一起呢？第一句話明明是把八种科目或研究对象，算在“旧社会学”之内的；可是下边却說，“講授时不能采取旧的立場观点与方法”。采取什么立場观点与方法？据說是“以历史唯物論的知識为基础”；那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場观点与方法研究这些社会現象，难道可以算在“旧社会学”之内嗎？可以算是“旧社会学”的“其他一些部分”

嗎？好象你吳景超是主張“以历史唯物論的知識为基础，来研究这些問題”的；可是，你怎么“忘記”了大文的題目是“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嗎？”难道历史唯物論、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以历史唯物論的知識为基础，来研究这些問題”，在新中国还发生有沒有地位的問題嗎？我想，邏輯家在这里要批“不合邏輯”，国文教員在这里要批“前言不搭后語”，“不通”。

然而，“不通”却正是它的妙处。最后一句話的妙用真是大矣哉：（一）可以表明（当然是造謠）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科学界的领导人竟不懂得：“以历史唯物論的知識为基础，来研究这些問題，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設，也还是有用的”，还得“內行”的吳景超重新“发明”一次，教訓一番！这和前边所說的“过去搞社会学的人，大部分都改业了”，配合起来，是可以大大加强挑撥作用的。（二）可以在被抓住狐狸尾巴时，抓着这句話进行狡辯。果然，在“交代”时，这句話成了他的“护身符了”。他說：我提出的主張是“想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这个問題”。如此說来，我們的批判，岂不是反对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这些社会問題嗎？吳景超岂不是完全正确的嗎？然而，謊言究竟掩盖不住事实。慢說你們的阴謀活动的事实了，就是你拿来作“护身符”的那句話，不也正是露出狐狸尾巴的所在嗎？

“文不对題”之妙

吳景超的文章，題目是“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嗎？”可是，在文章中却找不出一句正面答复这个問題的話，論据

就更不用說了；而且，不仅找不出一句正面答复這個問題的話，就連“地位”這個字眼，一個也找不到。如果把它拿給一位不問政治的中學國文教員，當作學生作文去批改，我想一定是四個字的總批：“文不對題”。

然而，妙也就妙在這裡。

“理論社會學”、“應用社會學”的八種科目，應該在大學里開課；“理論社會學”可以“豐富歷史唯物論”；“應用社會學”是研究“八種”社會問題的唯一科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根本不研究、也不懂這些問題，“院系調整”以後，這些學科成了空白點了——如是等等，“社會學在新中國還有地位嗎？”你們自己去得結論吧！反正會得出……。是的，按照吳景超的“高見”，社會學在新中國豈止還有地位，而是“大有可為”，理應取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指導思想地位而代之。不過，那時還是他們的“早春天氣”，對馬克思主義還得口頭上、抽象地承認的；其實只要把那“八種”社會問題的“研究”包辦過去，由政治陰謀家們去搞，“社會學”也確實可以盡其“鬧事科學”的作用了。

妙就妙在不正面點破。這樣，一，可以迷惑羣眾，陰謀被揭穿時進行狡辯；二，可以引導某些過去搞社會學的人發“思古之幽情”，這樣去激動他們，比正面點破的作用還可能大一些呢！

孫猴子變廟，是那條尾巴變大旗、插在廟後，壞了事，被楊二郎識破的。吳景超這篇文章的把戲也是壞在“廟後”的大旗上。把他們的反動政治陰謀揭穿之後，我們再看這篇文章，一看題目就覺得來勢不善，一張口就是爭地位。然而，

他們的目的就是要爭地位，爭資產階級反动社会学在我国的統治地位，不把旗子打出来插在“庙后”，又有什么办法呢？

* * *

吳景超的這篇文章，是章羅反动聯盟的大將們，公開談“恢复”資產階級反动社会学的第一篇文章。他說，這是一篇“試探性”的文章。不錯，是“試探性”的文章。然而，却不是他說的那種“試探性”。他在“交代”中，說是學朮性的試探，並且就此向党射出了一支最毒的毒箭：“我写那篇試探性的文章，事先并沒向領導請示。对于这种有原則性的問題，我沒有向党請示，就乱說乱动，便是一种无組織无紀律的行为。”有什么机关、什么人規定过发表學朮性的文章得事先向領導請示、向党請示呢？沒有，从来沒有过。做夢也不能說出这样的囈語。当然，这不是囈語，而是惡毒地攻击党，污蔑党的“百家爭鳴”的方針。吳景超的這篇文章，有那一句話算得學朮呢！那“試探性”乃是政治試探性，試探一下科学界、知識界的反映，特別是試探一下过去搞社会学的人反映如何，摸准气候，以便大規模地进行活动。当然，這篇文章又同时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和挑撥性。

吳景超的“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嗎？”，是該入“右派文选”的；因此，它也可以成为我們識別反动政治陰謀的反面“教材”。

（写于9月20日）

注：本文所說的社会学，都是指的資產階級的反动社会学，有些地方为了行文的方便，把前边的“附加語”省略了。这里應該說明：馬克思主义决非沒有自己的社会学；其社会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不过我們通常不用“社会学”这个名称罢了。这篇文章是在本書付排后加上去的。

駁所謂“一切領導階級都有局限性”

右派分子說：“領導者站在領導的崗位上，是有局限性的。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是一個進步的階級，但當它掌握了國家政權以後，就有了局限性；無產階級成了國家的領導階級以後，認識問題也就有了局限性。”於是，掌握了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和掌握了國家政權的資產階級是一樣的，成了保守的反動的勢力，理應在被打倒之列；於是，他們的卑鄙陰謀——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竟成了光榮的“革命”行動。其實，稍微剝一剝它的皮，便可看出這純粹是江湖騙子拍賣的殺人毒藥，除了反動和詭辯以外，什麼也沒有。

人的認識的兩種局限性

人的認識，從基本上說來，有兩種局限性，一種是社會實踐的局限性；一種是階級的局限性。所謂社會實踐的局限性，就是說：人們是在社會實踐的基礎上去發展自己的認識的，一般說，人的認識是不能超過社會實踐的水平。例如在原始社會里，人們不會有“機械化”的概念；在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還沒有充分發展，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還沒有充分暴露的時候，科學的社會主義便不能產生。無產階級也承認自己的認識受着社會實踐的局限，它

并不認為在今天社会實踐的水平上，就可以認識宇宙間的一切。所謂階級性的局限，主要的就是說：剝削階級受着它們的階級地位、階級偏見的限制，它們為剝削階級的狹隘的私利所限制，不能認識到从社会實踐的水平上說已經可以達到的認識，甚至只能得出完全錯誤的反動的認識。人的認識的這種階級的局限性，對於無產階級說來，無論在它取得政權以前還是取得政權以後，都是沒有的；而對於資產階級說來，無論它是否取得了政權，却都是有的，不過由於時代條件的不同，它的認識的局限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資產階級的階級局限性

資產階級是剝削階級。“追求利潤又利潤”，是資產階級的本性。一切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的人——資本家和他們的知識分子、“理論家”，觀察宇宙，觀察社會問題，都是從這個階級的狹隘的私利出發的。如果客觀真理對於它是有利的（只是在資產階級還是進步階級的時候，才在極有限的範圍內有這種情況），它才能認識；如果對於它是不利的，便死也不能認識，這就如同“夏蟲不能語于冰”是一樣的。

在十七、十八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代，資產階級還是一個進步的階級。當然，那時候，他們觀察宇宙、觀察社會問題的出發點，也是資產階級的狹隘的私利。但因為那時還處在封建統治之下，社會由封建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這個客觀規律，對於資產階級是有利的。所以，他們那個時候還能認識部分真理，他們的理論家也可以從理論上作出一定

的貢獻。但是，就是在那個時候，資產階級在認識上也有它不可克服的階級局限性。這就因為它是一個剝削階級，它能認識封建社會的不合理，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的矛盾，却不能認識、不敢承認資本主義是一個過渡的暫時的階段和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殘酷剝削。他們把資本主義制度說成是最合理的、永恆的。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缺乏才智和聰明，而是簡單的由於他們為狹隘的階級利益所限制。這種階級的局限性，是無論如何也突不破的。例如里嘉圖是一位偉大的古典經濟學家，但是，他無論如何也不能發現“剩餘價值”的理論。因為“剩餘價值”的理論，是揭露資本主義剝削的機密的，是證明資本主義由於內在矛盾必然走向死亡的理論基石。

現代資產階級和客觀真理無緣了

當資產階級奪取了國家政權，建立了資本主義社會以後，這個階級就變成了保守的、反動的。這個時候，它面臨的敵人是要顛覆資本主義制度的無產階級；封建勢力已經被打敗了，這時它不惜和封建殘余勢力勾結起來，鎮壓人民羣眾。這時社會進步的利益是由社會主義社會代替資本主義社會。這也正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而資產階級的狹隘的階級私利，却是和社會進步的利益完全敵對的，和社會發展的規律完全背道而馳的。在這種條件下，還是那個資產階級的階級局限性，注定了它不能認識任何關於社會的和哲學的真理。

馬克思對於資產階級的經濟學曾經寫道：“法英二國的

資產階級，都已經奪得了政權。從此以往，無論從實際方面說，還是從理論方面說，階級鬥爭都愈益採取公開的威脅的形態。科學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學之喪鐘，敲起來了。從此以往，成為問題的，已經不是這個理論還是那個理論合於真理的問題，只是它於資本有益還是有害，便利还是不便利，違背警章还是不違背警章的問題”^① 馬克思對於資產階級經濟學所說的話，對於資產階級的全部社會科學和哲學都是適用的。隨着資產階級的當權和反動，它和真理是完全無緣了，不但不能再發展社會科學和哲學，而且對於它的先輩所創造出來的合理的東西，也要加以拋棄和糟蹋。例如現代資產階級的新黑格爾學派對於黑格爾哲學就是這樣，他們要繼承和發展的是黑格爾哲學中的反動的東西，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却不遺余力地加以糟蹋。

問題不在“台上”“台下”，而在階級立場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兩點結論：（一）資產階級在革命時期，因為它的階級利益和社會進步的利益，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有一致之處，所以它能認識部分真理；但在這個時候，也有其不可克服的階級局限性。（二）資產階級掌握了國家政權，建立了資本主義社會以後，就成為了阻礙社會前進的反動階級，真理的揭露對於它是絕對不利的；所以它就與社會的哲學的真理完全絕緣了。這裡的局限

^①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頁。

性，并不在于资产阶级的这一派或那一派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资产阶级的这个或那个“理论家”是在政府里工作还是不在政府里工作，是当什么学会的会长还是会员，而在于他们的阶级立场、阶级私利，是拉着社会倒退的，在于他们的阶级偏见是维护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

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客观真理完全一致

我们说过：客观规律对于一个阶级是有利的，它才能认识，否则，是绝对不能认识的；因为任何阶级，都是站在自己的阶级利益的立场上，观察宇宙、观察社会问题的。这对于无产阶级说来，也不例外；但是，这里有一个根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区别，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客观真理，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完全一致的，永远一致的。无产阶级对于真理的认识，在任何时候，也没有阶级的局限性。这是为这个阶级的特殊的阶级地位、历史地位所决定的。

无产阶级是一个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的阶级，它是最彻底的革命的阶级。（一）对于无产阶级，没有任何东西是需要保守的。它与资产阶级根本相反，它的利益不是巩固自己的阶级地位。无产阶级要彻底解放自己，就必须消灭自己的阶级存在的条件，消灭阶级差别。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这并不是革命的终结，而是革命的开始。无产阶级所以需要无产阶级专政，所以需要对于国家的领导权，从根本上说来乃是在于彻底消灭剥削，彻底消灭阶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无

产阶级领导权是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强有力的工具，当然是不准剥削阶级把它夺去的；然而，无产阶级却不要求也绝对不需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当作千秋万世的东西。当着阶级差别已经彻底消灭的时候，无产阶级（或叫做工人阶级更适当一些）也就不存在了。当着全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已经彻底消灭的时候，国家政权也就自行消亡了。那时候，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也因为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要自行消亡的。到那时，全人类就得到了最后的解放。正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决定了它坚决追求的是共产主义，它不需要也绝对不会在半路上停顿下来。（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是永远一致、完全一致的。这个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须首先解放其他劳动群众。例如，它必须首先从封建的压迫下解放农民。固然，小农按其自发要求是趋向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这和无产阶级的要求是矛盾的。然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广大小农却是贫困、破产和无限的灾难。只有无产阶级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他们真正的最大的幸福。对于手工业者，也是这样。因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其他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或者确切一点说，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也正是代表了其他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它团结广大的劳动人民为推翻反动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而斗争，在取得政权以后，它仍然要团结广大劳动人民，巩固这个政权，利用这个政权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这也就是为社会进步的利益，为人类的最大幸福而斗

爭。(三)再重复一遍，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消灭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这也正是人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说，它的根本利益是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一致的。因此，它永远不害怕真理，相反地，越是深刻地揭露客观真理，就越对这个阶级有利，越能粉碎资产阶级的反动谬论，越能提高广大群众的觉悟，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而奋斗。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是这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也还是这样。

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在认识客观事物上，有什么变化没有呢？有的。但是，并不是什么莫须有的“阶级局限性”；而是因为它掌握了国家政权，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认识客观真理就有了更充分的客观有利条件了。例如：(一)在全国范围内广泛的建立了群众团体，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真正人民民主的政权，有了更充分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客观条件；(二)打破了反动派所造成的障碍，有了更充分的和各国无产阶级密切联系、交流经验的客观条件；(三)有了更充分的建立、扩大和训练、提高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客观条件。如是等等，说明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它认识真理的客观条件，是更为增加了。另外，由于社会实践水平的提高，作为时代的眼睛的无产阶级，也就能更进一步地发展真理。

通过以上简单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右派分子的“一切领导阶级都有局限性”的说法，是无耻的谰言。他们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样两个根本不同的阶级混同起

来，把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反动性，硬加在无产阶级的身上，这是恶毒地污蔑和无耻地造谣。

右派的诡辩

颠倒黑白的小丑所用的方法必然是诡辩术；这对于右派分子，当然也是不能例外的。

右派分子说：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能没有阶级的局限性？你们不是说领导者从上面看问题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吗？我们和诡辩论斗争，是有利于我们锻炼理论思维的能力的；希望读者注意右派分子在这里偷换对象的鬼把戏。

如果说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说的个别的领导人，那么，我们是承认往往有一定的局限性；然而这种所谓“局限性”和阶级的局限性，是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的。“人民日报”的“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的社论，指出：人民群众从下面看问题，领导者从上面看问题，往往有一定的局限性，“……领导者是直接行使管理权力而一般地难于参加体力劳动的。他们比较能够看到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比较容易疏忽人民群众的具体情况和切身要求。”领导者如果不注意克服这种客观条件的局限，就会犯出片面性的错误。然而，这和阶级的局限性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我们说过：所谓阶级的局限性，乃是指的一个阶级为它的狭隘的阶级私利所限制，对于对它不利的客观真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认识的。剥削阶级的这种阶级的局限性，是由它的社会地位带来的，是绝对不能克服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地

位、历史使命决定了它沒有这种局限性，它的領導者也决沒有这种局限性。

所謂領導者从上面看問題，人民羣众从下面看問題往往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因为它們的工作崗位不同（不是階級地位不同），因之所接触到的客观情况不同。但是，第一，这种因工作崗位而可能产生的局限性，并不是整个階級的局限性；第二，这种因工作崗位而可能产生的局限性，是能够避免和克服的。因为无产階級的領導者和无产階級羣众正是无产階級構成的本身，他們是統一的无产階級，領導者并沒有任何特殊的私利。只要正确处理領導和被領導的关系，就会避免和克服領導者和羣众因工作崗位而产生的局限性。由于我們党坚决实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和羣众路綫——这是避免和克服这种局限性的最根本的办法，所以就避免了从上面看問題的局限性，保障了党的方針、路綫、政策的正确性。当然，我們也并不否認有些領導者，他們由于思想方法上的缺点，在一个时期或某个問題上，忽略了人民羣众的具体情况 and 切身要求，因而違背了中央的政策，犯出了或多或少的錯誤。甚至还有极少数的，或多或少掺杂有非无产階級的个人打算，犯出較为严重的錯誤。这就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甚至其中还有宗派主义的作风。然而这是可以通过整风克服的。无产階級的階級利益要求必須克服这些东西。

右派分子把領導者可能产生的从上面看問題的局限性，偷偷換成“階級局限性”的概念，他們还暗中把无产階級的領

导者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群众对立起来。这就是右派分子在这个问题上所玩弄的骗人的诡辩术。

还有的右派分子，故意把社会实践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局限性混同起来。他们说：“你们不是说无产阶级，在认识上也有历史的局限性吗？我说无产阶级也有阶级的局限性有什么不对呢？”

不对，完全不对。社会实践的也就是历史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局限性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无产阶级公开承认自己的认识受着社会实践的限制，承认马列主义也没有认识了宇宙间的一切。但是，在现今这个时代，只有站在没有阶级局限性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能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发展真理。而害怕真理如同害怕火一样的资产阶级，却不但不能发现真理，而且要无耻的糟蹋人类已经发现的真理。

小論資產階級的“客觀”主義^①

右派分子說：掌握了政權的無產階級，也有了局限性。那麼，那個階級才沒有局限性呢？難道是拉着社會倒退的資產階級嗎？他們不敢公開的這樣說。他們所標榜的是資產階級的“客觀”主義。他們說：真理是客觀的，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階級立場則是主觀的，和認識真理是矛盾的，要認識真理，就不能要階級立場。先生，你們發明了幻術，你們這些也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竟拔着自己的頭髮飛上了天；

^① 這一節，在報紙上發表時因篇幅關係刪去了，現在補入。

然而，飞来飞去还是落在了现今世界上最不干净的地方——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正是资产阶级立场的表现。你们搬出这个破烂货，就是为了引诱立场不稳的人，离开无产阶级立场，站到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

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科学和哲学的阶级性。马克思、恩格斯公然申明，他们的学说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坚定的阶级性、党性，不但丝毫无损于它的科学性、客观性，而是和科学性、客观性完全一致的，内在的结合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因为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他才能深刻地揭露真理。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客观真理完全一致的缘故。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又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理论体现。而马克思主义敢于公然申明自己的阶级性，则是因为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占社会人口的大多数。明确地申明它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才更容易掌握解放自己的武器，而不受剥削阶级的欺骗。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不论他们有一千种、一万种，归根到底都是论证资本主义的“合理性”的。正是这种阶级性，使得它们不能认识客观真理。立场阻碍认识真理，只是对于反动阶级的阶级立场说来，才是正确的。

但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却要隐瞒他们的“理论”的阶级性，说他们的理论是超阶级的，全民的。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对少数，为了欺骗起见，是不敢公然申明自己的“理论”的阶级性的。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标榜“客

觀”主義的根本原因。資產階級的“客觀”主義的“客觀”，是加引號的，是最主觀主義不過的。

我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拾起了資產階級的“客觀”主義的破草帽，掩蓋他們的陰謀；把任何階級的階級立場和認識真理對立起來的右派先生們，不正是頑固地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因而和真理徹底絕緣了嗎？中國共產黨不正是站在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上，才堅持了真理，識破了右派分子的陰謀，明辨了大是大非，領導人民粉碎了資產階級右派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對真理的瘋狂進攻嗎？

現在的世界是：一部分資本主義已經進入墳墓；另一部分也快進入墳墓了。解放全人類的偉大任務已經歷史地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任何人要想無窮無盡地追求真理，就必須站穩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

資產階級的“客觀”主義滾開吧！

我們要在階級鬥爭中加強黨性的鍛煉，堅決地站穩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

（寫於8月19日）

談談友誼和階級性

“新社会里人情冷”的說法是惡意攻击

有人慨嘆近几年来人与人之間的友情疏淡了，言下大有今不如昔之感。这是真的嗎？不。然而却有人摆出很認真的样子去分析那个友情冷和淡的原因。我們无妨看看这种分析，那是可以帮助我們理解在右派的寒流襲来的时候，冒出来的“友情論”之實質的。

前些日子，人民日报登过一篇杂文，題目是“六亲不認”。这篇文章的作者認為：“友誼的花朵，多半是由于气候的关系开不出来。”妨碍或逕直是摧殘“友誼花朵”生長的，不是自然气候，而是政治气候：“在全国解放初期，一般知識分子，还是寻亲問友，把心底事傾倒在朋友面前。这里边有个人主义的牢騷；有自由主义；說不定还有反动思想。那时候，大家爱說，爱赤裸裸地表現自己。几年来在一些运动里，朋友間的这种‘傾談’有的上了‘材料’，甚或望风捕影，穷追其中的‘微言大意’。于是，許多知識分子‘逢人只說三分話’了。在肃反运动剛过去时，我听到許多人異口同声地說‘今后除了工作关系上的必要接触，断絕一切往还！’这話說得很决絕，但也很沉痛。”很清楚，这位作者認為友

情冷淡了的原因，乃是在于“一些运动”，特别是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他认为就是这种政治气候妨碍了、破坏了人们的友情。从客观效果看，这难道不是对于新社会的攻击吗？但是，我们也看出这位作者所慨叹失去而希望它归来的是一种什么“友谊”，那就是：只是倾倒心底事，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也不必批评，“反动思想”也绝对上不了“材料”；总之是不分是非，一团和气。右派分子费孝通，大叫“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看来，作者也受了不轻的感染。在作了上述分析之后，他高兴地说：“现在的情况变了。虽然是‘乍暖还寒’，但春意毕竟是来在了心头。……解冻的春风吹来了，友谊的花朵，开放吧。”不知作者要开放的是那种“友谊的花朵”？要在什么政治气候里开放？

更有甚者，说新社会里“六亲不认”，“新社会里人情冷！”这是右派分子的论调，这是对于新社会的恶意攻击。好的社会就是要人们生活得好，相处得好的。按右派分子的说法，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竟使得“人情冷”，远不如解放以前，它竟是损害和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友情”的，难道这个社会还应该让它继续存在吗？右派分子真是无孔不入，他们抓着一切可能迷惑人的东西，进行煽动。

“六亲不认”一文的作者未必完全同意右派分子的“新社会里人情冷”的论调。但是，他确是用超阶级的眼光看“友情”、“友谊”，用自由主义的眼光观察他自己和周围一小部分人的关系、几年来的变化；所以在右派分子煽起的狂风里，他就不由得向新社会和共产党射出了一支冷箭。

友誼和階級性

在階級社會里，人是作為階級的人而存在的。因此，觀察友誼和友情問題，就決不能離開人的階級立場和階級性。

首先，人們需要友誼，但是都是站在一定的階級立場上（雖然未必是自覺的）、帶着一定的階級要求，階級眼光和志趣去尋找友誼的。中國有句古話：“道不同不相與謀”，也就是說，道不同是做不成朋友的。在階級社會里，共同的階級利益，為一定的社會目標而奮鬥，是友誼結合的基礎。當然，這不是唯一的；除此之外，還必須有彼此之間的个人懷念和个人愛好的投合。同一階級的人，未必能成為很好的朋友；但是，階級立場對立的人們之間卻是絕對做不成朋友的。有誰見過奴隸主和奴隸，封建主和農奴，資本家和工人成為真正要好的朋友？

如果把不敬的意味去掉，那末，“氣味相投”對於一切朋友關係都是適用的。這其中有個人氣味的相投，但無論如何少不了政治氣味、階級氣味的相投。過去是如此，在今天也還是如此。

其次，友誼、友情也是各種各樣的。

有一種友誼，是以“腹腔的信念”為基礎的，即是所謂“酒肉朋友”，這是剝削社會的寄生階層中的一種“友誼”，他們結合的基礎是小惠小利，因此，極其瑣小的動機，也可以使這種“友誼”完全破產。這是對於友誼這個字眼的污辱。在反動剝削階級的中間，是沒有真正的友誼的，他們中間的一

些人的結合，是相互利用；今天为了夺一块骨头可以互相勾結，明天他們为了分贓可以撕破臉皮，互相拚命。这是为他們的階級性——“人不为己，天誅地灭”的人生哲学所决定的。

当然，也有这种友誼，没有什么政治目标，純粹是要从友誼中寻找避难所、逃避社会生活的“惊濤駭浪”，逃避爭取幸福的实际斗争；他們在一块聊天，可以談得来，也可以在生活中有某些相互帮助；然而，他們的相处是无原則、无是非的，因此也常常流于虛伪。而且社会生活的“惊濤駭浪”终究是避不开的。在大的风浪临到头上的时候，这种“友誼”、“友情”是經不住考驗的；当被社会上斗争之流冲去的时候，他們可能結合成另外一种友誼，也可能从此分手，各走各的路。

真正的友誼，高貴的友情，在历史上是在被压迫的人民、劳动人民这一方面发展起来的。他們反抗压迫和剝削，和惡势力作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发展和巩固了可貴的友誼。他們的階級性、社会本質是善良的，所以他們之間的友誼、友情也是真正的高貴的。患难相助是他們所要求的。他們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在为偉大的共同目标——爭取社会政治、文化的进步，使人民摆脱階級压迫和異族侵略，摆脱偏見、迷信等等的斗争中，发展了高貴的友誼，給后人留下了許多令人感动的友誼故事。

无产階級的目标是消灭階級，解放全人类的。它有最高尚的道德品質，共产主义精神，而沒有絲毫的利己主义。无产階級的階級性，正是社会主义友誼、最高尚的友情的精神

基础。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的友誼，就是这种友誼的最好的范例。列宁曾經写道：“古譚中有許多非常动人的友誼故事。欧洲无产階級有权說，它的科学是由兩位学者兼战士創造成的，这两个人相互間的关系超过了一切古譚中最令人感动的友誼的故事。”①

有人把“友情”看作是超階級的。这是不对的。不仅朋友必是“气味相投”，而且正是人們的这种或那种階級性，决定了他們結成何种友誼，他們之間的友情是何种友情。

有人把无产階級的階級性和友情对立起来，似乎无产階級是不通人情的，階級性多了，友情就少了。这是完全錯誤的。我們已經分析过，友誼和友情并不是超階級的。不錯，无产階級不要酒肉朋友，鄙棄图謀私利、因私廢公的友情。但是，他們在革命斗爭中、和平劳动中結成了真正的可貴的友誼，他們之間有严肃的批評与自我批評，有真正的深切的相互关怀和幫助，他們的友誼真正能够經得起時間和风浪的考驗。这种友誼，跟那种在自己小天地里結成的小圈子“友誼”，是高貴得不可比拟的。

社会的大变革使得一部分人的原来的 “友誼”結合也发生了变化

友誼关系并非超階級的，社会关系之外的关系。所以社会的大变革，也就不能不使得一部分人的原来的“友誼”結合

① “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1953年，人民出版社，第52頁。

发生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几年来在知識分子中表现得最明显。这是因为他們当中有許多人的友誼原本是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的，是以自由主义作为結合的基础的。不过，变化也有多种情形。

經過“一些运动”，朋友的双方都进步了，他們有了明确的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偉大目标，他們的关系以批評和自我批評代替了自由主义；在这个基础上，他們的友情变了，变得更亲密、更知己、更高貴了。他們也許因为在不同的崗位上工作，因为工作忙，在一块飲茶、喝酒、聊天的机会少了；但是，这难道有損于高貴的友情嗎？不！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友情，是把他們的心联結在一起，任何东西也分不开的。

說近几年来友情冷淡的人們，为什么看不到这种变化？

当然也有另一种变化：原来的“友誼”被“批評”得冷淡了。譬如一方进步了，一方还保持原来那个样子，或是更落后了；因此一方要求社会主义的友誼，一方要求保持和发展自由主义的結合。这种矛盾不解决，在感情上就格格不入，显得有些冷淡。当然，对落后的朋友不能拋棄，那是不符合共产主义的道德的；应该帮助他进步，在帮助他进步的基础上，高貴的友誼会发展起来。一般而論，这种疏淡是暫时的，是从原来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友誼到社会主义友誼变化中的現象。“团結——批評——团結”的公式，在朋友关系上也是适用的。

还有另一种变化：在原来的自由主义結合的小圈子內，有坏分子，他或原本是反革命分子，鑽进来利用“朋友”的，

或在社会大变革当中要实行螳臂擋車。这自然是要分道揚鑣的；否則只有和他同流合污。你揭发了他，他会罵你“卖友求荣”，你怕罵，留恋和他的友誼？还是明白过来，認為上了他的当呢？

我看，上面所說的几种变化是很自然的；决不能由此作出近几年来友情冷的結論的。說这种話的，除了別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就是这种人：他們一方面有一定的社会主义觉悟，一方面又有濃厚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因此，一方面和要求社会主义的友誼的人，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和要求完全自由主义結合的人，也有些格格不入。他們感到孤独了，寂寞了，但沒有了解是怎末一回事。在右派分子煽起的狂风中，他們更糊涂了；习惯地用超阶级的友誼的观点观察他和他周圍人关系的变化，于是得出結論說：近几年人們的友誼冷淡了呀！这怪“一些运动”呀！其結果是給右派分子帮了腔、供給了进攻社会主义的子彈。

特別被攻击得厉害的，是一些出身于地主、资本家家庭的进步青年，和家庭断絕关系，不理他們的父兄。有人罵他們沒有人情味，六亲不認，違背孝道。这是右派分子的論調。我們說：这确是值得表揚的进步現象，應該为他們鼓掌。固然，我們并不要求所有地主资本家家庭出身的青年，非一律和他們的父兄断絕关系不可；也不贊成无条件的永远和他們的父兄断絕关系。但是，当他們的父兄頑固地反对土地改革、抵抗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以封建的“孝悌之道”逼迫他們的时候，他們和家庭断絕关系，是做得

完全正确的。这违背了什么孝道？右派老爷们，你们认为只有“为了对老子行孝”而叛变革命的杨邨人之流才是最尽孝道的孝子！然而，这号人不过是把他的老子当作挡箭牌使用罢了。

高贵的社会主义的友谊正在迅速生长

社会主义社会，给人们创立了建立最高贵最真诚的友谊的物质基础。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制度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伟大目标，把人们联合起来；人们之间的不信任，尔虞我诈，互相敌对，将成为历史的陈迹；父与子，青年和老年，城里人和乡下人，这一行业 and 那一行业的人，将再不会有敌对的恶意。社会主义制度为人们之间发展高贵的友谊，铺平了道路。

在我国，这几年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的伟大阶级斗争中，社会主义的友谊花朵，是处在史无前例的迅速生长过程中的。前边我们谈到，近几年来知识分子中友谊关系的变化，从总的方面说来，那正是社会主义的友谊的生长。如果是从劳动人民方面看看，那末，问题就更加明显了。工人阶级方面不必说，就说农民吧：曾经在某种程度上隔离他们的小私有制废除了，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他们的自私自利的思想大大地削弱了，集体主义的思想在增长着；地主挑拨他们的关系的阴谋再也不能得逞了。集体农民们发展着真诚互助的友谊关系，和睦友爱的家庭。爱情，再也不是被门第和金钱所歪曲的了；而是在为了共同目标而斗争中，在共同劳动和学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真诚无私的、互助友

爱、互相尊敬的爱情。再如农业合作社里实行的对孤寡的“五保”这件事吧！这份友情不是十分高贵的嗎？在旧社会里有过嗎？右派分子，你說，这是人情冷，还是人情暖？反动剝削階級分子，在他們自己的集团里也不能有这样的事情。他們中的“慈善家”，救济孤寡的所謂“慈善事业”，也不过是挂块招牌求名而且从中漁利，貪污中飽。右派分子的“新社会里人情冷”的論調，只是无中生有，惡意中伤。他們也許覺得真的“冷”，那便是发財的“热”、被捧的“热”沒有了；竟成了平民，沒有了（或少了）帮閑們圍在他們周圍、抬他們的轎子的热烘烘，岂不冷么也哉！

当然，无可諱言，我們也决不諱言，今天还有遺棄父母和爱人，对朋友无信无义等类不道德的人和事。然而，这是从旧社会遺留下来的污毒，这正是資产階級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这类事，不是比旧社会里少得多了嗎？用这来給新社会抹灰是不成的。我們正是要彻底消灭这类的事；而且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把它彻底消灭的基础。

也有极少数人在友誼問題上有小資产階級的偏激情緒：旧社会里的上层知識分子的友誼，常常流于虛伪，无是非，因私廢公，这是應該否定的；少数具有偏激情緒的人，却因而是要排斥一切友誼。这是不对的。但应說明：这种情形是少数的，暫时的；跟“新社会里人情冷”的謬論是毫不相干的。

超階級的友誼論，滾它的吧！

社会主义的友誼花朵，更茂盛地生長吧！

（写于7月26日）

略論人性和階級性

徐懋庸在“过了时的紀念”^①一文中，提出了一個論點：各個階級的人具有共同的人性，雖則和階級性比較起來是次要的，但是否認它，許多生活問題是解釋不通的，而且在實踐上尤其是在文藝創作上是有嚴重危害性的。巴人在“論人情”^②一文中提出：所有的人都有共同的人情。雖曰人情，其實他所說的也是人性。他以為各階級之間有着共同相通的人情，並且把它看作是文藝作品的靈魂，所以論完了人情就來招魂：“魂兮歸來，我們文藝作品中的人情呵！”從徐懋庸說的“解釋不通”、“危害”，從巴人給文藝作品的招魂看來，那“人性論”或“人情論”是很重要的。不知是由于我不懂文藝，還是太不通人情，怎末也接受不了他們的“人性論”；我固執地以為：他們所說的那種“人性”、“人情”，是未必實有的。

“人性”是社會學的範疇

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的一切哲學家，都是抽象的、即離

① 載“文匯報”1957年6月7日“筆會”。

② 載“新港”1957年1月号。該刊3月号發表了張學新的“‘人情論’還是人性論”，提出了批評。我基本上同意他的論點；本文不再重復張文提出的批評意見。

开人的社会性、离开历史的发展考察人性的，所以，他們对这个問題一直是糾纏不清；旧唯物主义哲学家們，无例外地在这个問題上失足(如果他議論到这个問題的話)，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馬克思在批判費尔巴哈时写道：“費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質還元为人的本質。但是，人的本質，并不是个别的个体所具有的抽象屬性。就其现实性來說，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 这就是說：人的本質并不是人們的生理本能；而是人的社会特質。人，都是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离开社会的完全孤独的个人是沒有的。所以，人性也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抽象的永远不变的人性是沒有的。脫离开人的社会性，把人作为單独的个体，去抽象他們的共同屬性，那么，抽象出来的只能是人的自然本質。費尔巴哈的思想方法上的錯誤正是在这里。他所把握到的是生理学上的人，是和別人不发生任何关系的、实际上不存在的抽象的人。他以人的自然本質頂替人的社会本質。例如他以兩性間的爱解釋社会生活，所以也就不能不陷入历史唯心主义了。正如恩格斯所說：費尔巴哈在社会問題上，自然太多，政治太少。人是营社会生活的；社会性正是人与动物的最本質的差別。社会是变化的，人性也是变化的。只有从一定时代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才能揭露现实的具體的人性。馬克思还說过：“‘特殊的人格’的本質，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2卷，第403頁。着重点是原有的。

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質”^①。“社会特質”也就是作为社会的人的人性。对“人性”这个概念作这样的了解，对于社会科学，对于解释社会生活，才是有意义的。考察人的自然本质，生理学上的本能，那是生理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的事。

徐懋庸说：“人类之有共同的一般人性，正如它还有与其他生物共同的生物性一样，是不能否认的。”所有的人，都是生理学上的人，其自然本质是共同的，这是一回事，这是用不着争论的；所有的人有共同的社会本质，这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不能以“人还有与其他生物共同的生物性”作证明的。徐懋庸所说的“人性”是不是指的人的自然本质呢？不是的，他实际上是指的人的社会本质；或者说是以人的自然本质顶替人的社会本质，用以解释社会生活。例如他说：“倘若没有某些共同人性的基础，中国资产阶级为什么竟可以改造成社会主义者”。可见他指的是人的社会本质。作为生理学上的人，当然资本家和工人是一样的，然而这对于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巴人所说，作为文艺作品的灵魂的“人情”或“人性”，不是也不可能是指的人的自然本质；把人作为生理学上的人去描写，还成其为什么文艺作品呢？

因此，对于人性和阶级性这个问题，我们所讨论的不是各个阶级的人在生理上有没有共同性；而是讨论的各个阶级的人有没有共同的社会本质，或者说，人性作为社会学的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70页。

嚙，在階級社會里它和人的階級性是不是一致的，階級性是不是就是具體的人性。

究竟有沒有超階級的人性？

我認為在階級社會里，階級性就是具體的人性；共同的、即統一的超階級的人性是沒有的。徐懋庸和巴人認為超階級的人性是有的。那末，敵對階級的共同人性是什麼呢？徐懋庸在他的文章里，沒有說出那共同人性的內容，但是有一段關於“人性一般”的議論。那是很值得討論的。他寫道：“馬克思論生產，以為‘生產一般，是一個抽象，但是在它真正把共同之點提出來、固定下來、因而省得我們重複的限度以內，是一個合理的抽象’，沒有這個一般，‘任何生產都無從設想’。不過，只認識生產一般的共同特點，是沒有用的，在具體分析的時候，還要不‘忘記了本質的差別’。”這些話當然是對的。但是，他接着說：“我以為人性一般同階級性的關係，也是如此”；按照他對於“人性一般”的了解，各個階級有在具體內容上共同的人性，這就大成問題了。馬克思的“生產一般”並不能成為徐懋庸的“人性一般”的論據。他的“人性一般”的抽象和馬克思的“生產一般”的抽象是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的。

馬克思的“生產一般”所“提出來”的、“固定下來”的“共同之點”是什麼呢？馬克思寫道：“主體是人，客體是自然，這總是一樣，這裡已經有了統一，而我們之所以要把對一般生產適用的種種規定區別開來，正是為了不致於因為統一而

忘記了本質的差別。”^①可見“生产一般”所提出来的、固定下来的是屬於人和自然的关系方面的；就是人对自然物的劳动加工，人对自然物的改造。这个抽象是合理的，必要的；經過这种抽象才能把具体劳动还原为抽象劳动，“价值論”才是可以論証的。但是，馬克思也同时指出：在“省得我們重复的限度以內”才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他一再申明，生产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在一定的社会形态內进行的，“一般生产”是实际上不存在的。徐懋庸的“人性一般”，却是要从敌对階級中抽出在具体內容上共同的、在生活中实有的超階級的“人性”，这和馬克思的“生产一般”的抽象，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徐懋庸要在不同階級的人的社会本性中，抽出內容共同的人性来；在他看来，这种“人性”就是各个階級共有的善良品質，不过反动階級少一些罢了。他說：“……在階級社会里，一般人性被階級性排斥到人性的次要地位，而且往往因階級性而变质，特別在階級斗争劇烈的时候，一般人性常常似乎完全消失了。”說得明白一点就是：（一）一般人性和階級性是互相排斥的，一般人性是善良的，階級性或作为階級性的人性是否善良，那就應該另作別論；（二）因此，不同階級的人除了具有不同的階級性以外，还有內容相同的共同人性，即超階級的、超乎階級性之上或之外的人性，不过，被階級性排斥到次要地位罢了；（三）虽然，一般人性，“往往因階級性而变质”，“在階級斗争劇烈的时候，一般人性

^① 馬克思：“政治經濟学批判”，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48頁。

常常是似乎完全消失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消失。明明白白，他所說的不正是超階級的“人性”嗎？虽然在字面上，他說这种超階級的人性被階級性排斥到了次要地位；实际上却不然。例如，他認為資產階級分子所以能被改造成社会主义者，不借助于超階級的人性就不能解釋。把这种重要的社会現象，归根于超階級的人性，它怎么还能是处于“次要地位”的东西呢？其实，他所举的例子，恰好証明这种論点的站不住。他說：“例如，作为人的本質的劳动，本来是共同的人性，但在階級社会里，这个人性被歪曲了，剝削者以此为可耻”。我不懂这和他的“人性論”怎么联系得起来？且看他是怎么論証的：他接着說，“……剝削者以此为可耻，但还是需要被剝削者来实现它，被剝削者以此为累贅，但还是不得不去实现它”。原来这就是共同的一般人性！剝削者强迫被剝削者替他們劳动，被剝削者被迫为剝削者劳动，創造剩余生产物，这就是他們共同的一般人性！大概奴隶主把奴隶鎖在鎖鏈上做工，还供給奴隶最低生活物品不使他們餓死，也算是那个善良的一般人性？我們真不知道徐懋庸心目中那个“一般人性”是什么？难道剝削者以劳动为可耻，以剝削他人的劳动果实为光荣、为正义，不正是他們的階級性嗎？用徐懋庸的話來說，这不正是“作为人的本質的劳动”因“階級性而变質”了嗎？明白一点說，不就是“作为人的本質的劳动”，不再为剝削階級的人所有了嗎？“被剝削者以劳动为累贅”的說法，也并不能証明什么超階級的人性。不錯，馬克思說过：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才將在社会成員面前，从累贅变成

“生活的第一需要。”但那是說的，那时生产力高度发达（例如全面的实现了自动化，沒有了笨重的損害身体健康的体力劳动），生活物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实现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劳动也就成了如同体育、文娱活动般的“生活的第一需要”了。这和超阶级的人性論有什么相干呢？爱劳动是劳动人民的本质；剝削他人的劳动是一切剝削阶级的共同本质，这里有什么超阶级的共同人性呢？当然，劳动者中間可能从剝削阶级那里沾染上对于“劳动”的某些不正确的看法；但是，那是另外一回事。我們不能把各个阶级在观念形态上的相互影响的事实，当作超阶级的人性。

巴人倒是指出了共同人性（或人情）的具体内容；然而，那恰恰証明了他在这个問題上离开了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他說：“什么是人情呢？我以为：人情是人和人之間共同相通的东西。飲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鳥語，这是人所共同喜爱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飽，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的共同的希望。……这些要求、喜爱和希望，可說是出乎人类本性的。”不錯，这些要求、喜爱和希望是出乎人类本性的；但是，在阶级社会里，互相敌对的阶级在“这些要求、喜爱和希望”上有共同的内容嗎？要求“飲和食”，要求“男男女女”，从生理上看是共同的，这是为共同的自然本质决定的。然而，从人的社会本质上来看却不能是相同的。有人要吃剝削飯，并不准別人吃飽飯；有人要吃自己劳动得来的飯，希望人家也吃飽飯。有人自己要飲水，也要人家飲水；有人却要飲別人身上的血。这有什么絲毫共

同之处呢？至于“花香、鳥語”那是人对自然景物的欣賞。不但人們共同喜愛“花香、鳥語”，而且还共同喜欢吸新鮮空气。这和超階級的人性或人情有什么相干呢？而且，究其实，餓肚皮、淌臭汗的人是沒有閑情逸致領略“花香、鳥語”的。不錯，所有的人都“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发展”；然而，在階級社会里却偏偏有一伙人，自己要生存而不准別人生存，自己要溫飽定要別人挨餓受冻，自己要发展定要別人当奴隶。难道他們所希望的有共同的内容嗎？都是人，但地主和农民，美国的煤油大王和殖民地檢煤渣的老太婆，还有，直到今天我們还有些知識分子和劳动人民，在感情上竟是格格不入，那样不能“相通”，这又是什么緣故呢？請問，这里有共同相通的“人情”、“人性”嗎？畢竟階級斗争是客觀的最本質的事实，所以巴人的“人性論”是不能貫徹到底，无法自圓其說的。他一方面大論其各个階級的“共同希望”，另一方面又在“共同希望”的前边加了一个“普通人”的限制；那么“非普通人”呢？他們在“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发展”的希望上，岂不是不相同，而且恰好相反嗎？这里有什么“人和人之間共同相通的”人情（或人性）呢？他还說：

“如果，这社会有人阻止或妨害这些普通人的要求、喜愛和希望，那就会有人起来反抗和斗争。”“而階級社会則总是压抑人类本性的，这就有階級斗争。”可見，無論如何还得有普通人和非普通人之分，如果說普通人的要求、喜愛和希望是合乎人情的，那些“阻止或妨害”普通人这些要求、喜愛和希望的岂不是不通人情？如果說普通人是尊重人类本性的，那

些非普通人豈不是違背人類本性，喪失了人性嗎？說來說去，在階級社會里畢竟有兩部分人，在感情上是不能相通的。超階級的“人情論”豈不是落了空？

不同階級的人的社會本質，是由他們的社會存在、階級地位決定的。正如劉少奇同志在“人的階級性”一文中所說：

“一定集團的人們，長期站在一定的階級地位，即站在一定的社會生產地位，以一定的方式，長期的生產着、生活着與鬥爭着，即產生他們的特殊生活樣式、特殊的利益、特殊的要求、特殊的心理、思想、習慣、觀點和氣派，及其對其他集團人們與各種事物的特殊關係等等，而與其他集團的人們不同，或者相反。這就形成了人們特殊的性格、特殊的階級性。”^①在階級社會里，超階級的人是不存在的，所以超階級的人性也是沒有的。誰要否認這一點，就是否認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原理，否認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個基本原理。

關於中國資產階級的改造問題

徐懋庸認為：“根本否認人性存在的階級性論，……解釋不了社會生活中的許多實際問題”。他的實例之一是：“倘若沒有某些共同人性的基礎，中國資產階級為什麼竟可以改造成為社會主義者”。中國資產階級究竟為什麼可以改造？照徐懋庸看來，其根本原因——至少是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它

^①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195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91頁。

和无产階級“有某些共同人性的基础”。这种成为資产階級变为社会主义者的根据的“人性”，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徐懋庸沒有說。我們可以先看一看巴人的一段議論；那是可以和徐懋庸的議論相互发明的。他說：文艺为階級斗争服务，必須描写“人和人之間共同相通”的人情。“描写階級斗争为的叫·人·明·白·階·級·存·在·之·可·惡，不仅要喚起同階級的人去斗争，也應該讓·敌·对·階·級·的·人，看了发抖或愧死，瓦解他們的精神。这就必須有·人·人·相·通·的·东·西·做·基·础，而这个基础就是·人·情，也就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着重点是引者加的）巴人告訴我們的有兩点：

（一）互相敌对的階級也有“相通的东西”，这种“相通”的东西就是“人情”，即“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徐懋庸說的那种成为資产階級改造成社会主义者的根据的人性，大概也就是类乎巴人說的那种“人情”、“出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吧？不然，怎末能和无产階級、社会主义相通呢？怎末能够成为資产階級“改造成社会主义者”的根据呢？如果，这种观点可以成立的話，那末，資产階級右派分子章乃器的“紅色資产階級”謬論，岂不也多少有些道理？按照徐懋庸的說法：既然資产階級具有某些和无产階級“共同的人性”，当然这些“人性”是不需要加以否定，而應該加以发揚的；这末說来，章乃器的否認資产階級必須进行“脫胎換骨”的改造，岂不也有道理？然而階級斗争的事实告訴我們，那是彻头彻尾的伪造。資产階級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的瘋狂进攻，惡毒的咒罵，难道不是完全証明了他們和我們并沒有任何“共同

相通”的人性或人情嗎？我們認為社会主义最合乎人性；他們認為資本主义最合乎人性，这里有什么相同之点呢？

（二）巴人告訴我們的另一条道理是：敌对階級的人看了具有“人情”的文艺作品，会愧死和精神瓦解。徐懋庸說：“資產階級所以能改造成社会主义者”是由于它具有某些和无产階級“共同的人性的基础”；那么，所謂“改造”，也就是因為他們有“人性”，而受到道義的感動，而“慚愧”而“精神瓦解”吧？这不是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太远了嗎？

馬克思說：“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来摧毀”^①。十八世紀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用說服富人和皇帝的方法实行他們的理想，大概也就是惑于那个“人和人之間共同相通”的人情吧？惑于富人和皇帝也有点“出于人类本性的”共通人性吧？

我国用和平改造的方法消灭資本主义和資產階級；但是，“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来摧毀”，在原則上也还是适用的。中国資產階級所以逐步地接受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最根本的原因是党的方針正确，无产階級的政治和經濟的絕對优势，以及国际形势有利等等，由于这些造成了一个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可的大勢，資產階級才在大勢所趋之下不得不然地接受改造。这完全不是因为什么資產階級有某些和无产階級“共同的人性基础”。如果我們沒有巩固的人民民主專政政权、强大的社会主义經濟……物質基础，要改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60頁。

造資本主义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然可以而且应该从资产阶级方面探讨它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因；然而，这里起作用的仍然是阶级性，而不是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当然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具有共同的阶级性，因此，它也是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关系，它的阶级性和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有所不同，这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它还有两面性。从经济上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是很薄弱的，这就造成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这种软弱性，在民主革命阶段就是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软弱，那时，他们一方面有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性，一方面又有动摇性和妥协性。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个阶级的软弱性便成了在一定条件下向社会主义屈服，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如果是垄断资产阶级，当然就不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因为无产阶级不对它实行强力剥夺，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而没有强大的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根本谈不到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的。从政治上来说：民族资产阶级在旧中国基本上没有掌握过政权，他们在政治上也是受压迫的。民主革命胜利，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民族资产阶级不是从政权的最高峰被推下来，而是相反地参加了政权，虽然在这个政权中不占主要地位。因此，他们采取了基本上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当然是就大多数来说）。但是，这个国家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的，这又和他们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是尖锐抵触

的。这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这种阶级性的特点，也就成了在一定条件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当然，现在的资产阶级右派，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根本谈不上什么两面性。

资产阶级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在经济上谁战胜谁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而意识形态上的谁战胜谁的问题，却还没有解决。他们上了社会主义的船还懊悔，还留恋资本主义，一有机会还企图倒回资本主义去。他们在各个方面顽强地表现自己的世界观和阶级意识。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向社会主义发动的疯狂进攻中，这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如果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就变成了社会主义者，那真是痴人说梦。放弃生产资料的占有，那是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社会主义者的物质基础。要成为社会主义者还必须在经济地位改变的基础上，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这就是说，必须彻底否定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换上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对于它的原来的“人性”是不能有所保留的。所谓“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社会主义者”，乃是在他们的经济地位改变的基础上，以共产主义改造他们的思想。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资产阶级分子在经济地位改变之后，其思想意识是可以改变的；这里并不是因为它和无产阶级有“某些共同人性的基础”。

上面的分析，远不是充分的。但是，已经可以完全证

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在经济地位改变之后能够改造成社会主义者，完全不是由于他们具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徐懋庸以“人性论”来解释“中国资产阶级为什么能够改造成社会主义者”，能得到些什么呢？不但会是越解释越糊涂，而且还危险得很！除了模糊阶级界限，模糊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还能得到什么呢？这是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欢迎的。以超阶级的“人性论”，解释阶级社会里的社会生活，也只能是得到这样的结果。

关于“李后主的词”

徐懋庸还提出，根本否认超阶级的人性，“特别解释不了李后主的词为什么能感动人民之类的文艺问题。”我看，这类文艺问题，并不能证明超阶级的人性的存在，事情倒是恰好相反的。

我们举李后主的“虞美人”为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还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首词，是不是对所有的人都能感动呢？我看未必；至少它在当年就没有感动了宋太宗，相反地，“小楼昨夜又东风”及“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却成了坐罪赐死的原因之一。①人

① 史傳：宋太宗令李煜故臣徐鉉去見李煜。后主相持大哭，并長嘆曰：“当时悔杀潘佑、李平。”太宗查知，遂有賜牽机药之事。……又傳“小楼昨夜又东风”及“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并坐之，遂被禍云。（据“唐五代词”校記）

情啊！在宋太宗和李后主之間为什么竟是这样不能相通呢？

时过境迁，这首詞的确能够感动各阶级的人（包括人民在内）。原因在那里？从客观对象——“詞”來說，就是它有相当高的艺术性，真实、生动地表现了他亡国以后的哀愁、感伤、怀旧的情感。从主体——人來說，就是因为有喜怒哀乐的情感。喜怒哀乐的感情，不是各个阶级的人都有的嗎？是的，但问题是所喜、所哀、所乐、所怒在具体內容上，不同阶级的人却是不同的，甚或是完全相反的。不同阶级的人，都可能被李后主的詞所感动，但是“感动”的具体內容，即为首首詞所刺激而引出来的感情，却是不同的。而这才正是人的社会本質的表现。

无产阶级的战士，讀这首詞也会受到感动，然而那“感动”也不过是：亡国之君的下場头就是如此。那哀婉、凄切的情感，或者说动人的韻律，在一定条件下对于激励人們的爱国的情感，也可能有些作用；虽然，他那“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国”和我們心目中的“国”根本不是一回事。但无产阶级的战士，对李后主这个人是不会贊許和同情的（如果不是單指艺术才能的話）；特别是和那“問君还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更是无缘的。无产阶级的战士在危难的时刻，絕不会和这种情緒起共鳴的，那偉大的英雄气概是：“此去泉台集旧部，旌旗十万斬閻罗”（陈毅詩）。如果一个革命者在危难的时候，竟一腔悲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什么感情呢？应该說，是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的表现吧？小资产阶级固然可能被这首詞激动爱国心，然而却也常常或者说更多的是被引发出一些不健康的東西来，例如

“多愁善感”、“悲觀悔恨”、“无原則的同情失敗者”、“濫情主义”等等；这些也正是小資產階級的东西。

买办資產階級能不能被这首詞感动呢？当他们走“紅运”的时候，显然是不能的。他們大勢去了，作了亡命之徒，对这首詞倒是可以欣賞的。例如台灣的蔣介石之流，也可能被“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特别是“雕闌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顏改”打动吧！然而，他們悲叹和悔恨的是他們的江山“亡”給中国人民了。这和中国人民那有什么“共同相通”的人情呢？

已經接受了公私合营的資本家，讀了李后主这首詞会引起什么感慨来呢？慨叹“合营后作了亡国之民”就是一种。他們悲切的是“資本主义王国”亡了，作了社会主义之民；他們怀念的是資本主义；他們的資本主义之心沒有死，恰似当年李后主的心情，——不过无產階級，对待他們是决不会和宋太宗对待李后主那樣的。对于无產階級說来，实现了公私合营是天大的喜事，資本家竟說“作了亡国之民”；人情竟是这样不能相通的！

由以上所說可見：不同立場的人，被李后主的詞引发出来的感情是极不相同的，心理状态是各異的，对这首詞欣賞的重点也是大不一样的。这叫作“各取所需，各感所感”吧！原因在那里？难道不是由于階級地位不同、教养不同以及他們的遭遇不同，簡言之，人性不同的緣故嗎？我看，这恰恰的是証明了超階級的“人性論”或“人情論”的破产。“李后主的詞之类的文艺問題”，并不能証明超階級的人性或人情的存在，不过是这类問題很容易迷惑人罢了。

危險的藥方

徐懋庸和巴人并不是“无的放矢”的；而是要匡正“时弊”的。徐懋庸說：“那些不承認人性而自以为无产階級性極強的人們……使自己的行为变成矯情，并且不能懂得別人的心理，而在創作上，也只会使得作品中的人物显得不合情理。”那对症下药的藥方，当然就是用超階級的人性补充階級性論了。巴人認為超階級的“人情”，是文艺作品的灵魂，据说現在的文艺作品（至少是很大的一部分吧？）掉了魂，因而公式化。他开出的藥法，就是：为文艺作品招魂，招超階級的“人与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人情”之魂！

我看，他們开的藥方是极为危險的。

为什么无产階級不用超階級的“人性”来补充，就会使自己的行为变成矯情呢？无产階級的階級性是最高尚的人性，是最合乎人情的。例如无产階級的战士，为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必要，牺牲个人利益以至家庭利益；从个人主义的眼光看来这是“矯情”，但我們看来却是最高尚的美德。如果把这些叫作“矯情”——还有人罵我們斗争反革命是“矯情”呢！——那就讓他去說吧，罵吧，我們还是要坚定不移地去提倡的。矯情，如果是指的在同志、朋友、家庭关系上的“虛伪做作”，自以为不要朋友，不顧家庭才叫階級性强，而摆出“道貌岸然”的样子……，那当然是要矯正的。但是，这种矯情不正是和无产階級的階級性不相容的嗎？这里需要的正是要加强无产階級的階級性，克服个人主义。我看，用超階級的人性論，去“矯正”矯情，那是会把党性“矯”掉的。

“不懂得人的心理”，其原因是很多的。例如缺乏社会經驗，缺乏心理学的知識和工作作风的粗枝大叶等等；但無論如何，強調階級性却不能成为原因之一。相反的，在階級社会里，“階級性論”却是“懂得人的心理”的指南或基本前提。当然，只注意階級的共性，否認作为階級的人的个性，那是不能具体地懂得人的心理的。但是，这是把“階級性論”变成教条主义的結果，而并不是由于沒有用虛構的“人性論”来补充（或作指导）的緣故。我看，脫离开“階級論”，在“人性論”指导之下去了解人的心理，那是定要上当的。

关于文艺創作的公式化，“人物显得不合情理”，那原因是很多的。例如有人只承認階級的共性，否認階級的人的个性、具体特征，就是一条；但这未必是普遍的、最重要的。無論如何，缺少各个階級共同相通的人情或人性，决不能是原因之一，因为那种东西是不存在的。人物形象，当然不能是“階級性論”的注釋和图解，否則就失去了艺术特征。反映階級社会的人和事的作品，它的人物是作为階級的人而存在的，它不能离开階級性；而是描写人物的个性，从而把階級性具象化，这又必須是在典型环境中，在复杂的階級斗争中展开的。把人物写活是不容易的，只是有了正确的世界觀、階級論，还是不行的；重要的还得有丰富深刻的生活体验和高度的艺术修养。关于文艺創作，我說的都是外行話；但是，我敢断定：那关键决不在于离开階級性去描写超階級的人性。

“魂兮归来，我們文艺作品中的人情呵！”——这要招来什么魔鬼啊？！我看，还是超階級的“人性論”、“人情論”滾开吧！不要再纏我們的同志！

（写于8月1日）

为什么必須反对絕對平均主义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說我們的社會里不平等，存在着“等級制度”。這是惡毒的造謠和污蔑，本是显而易見的。但是有些人，听了右派分子的这种話却分辨不清楚，覺着他們說的还有些道理，甚至随声附和起来。其原因在哪里？我想，原因之一，就是有絕對平均主义的思想作怪。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当然不是什么平均主义者；但是他們在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中，却是使用了絕對平均主义这个武器。因此，我們必須弄清什么是絕對平均主义？为什么說絕對平均主义是反动的？

絕對平均主义原是小生产者的一种幻想

“絕對平均主义的来源……是手工业和小农經濟的产物”^①。手工业者和小农是劳动者，在旧社会里是受压迫受剝削的。他們要求革命，他們要求改变自己的經濟地位和生活条件。但是，他們受着小生产者眼界的限制，却不可能找到彻底解放自己的道路。他們只能想出各种各样的幻想。絕對平均主义就是这样的幻想的一种。他們想：实行絕對平均主义，把現有生产資料实行絕對的平均分配，大家生活得都一

① “毛澤东选集”第一卷，第93頁。

样，就沒有剝削和压迫了。他們把这种想法叫作“均产”或“共产”。手工业者和小农是真誠的这样想的，他們的主觀动机也是善良的。但是，我們知道：这是違背經濟发展的規律的，因而是根本行不通的。个体手工业和小农經濟是产生資本主义的溫床；設若实行了生产資料的絕對平均分配，按着商品經濟运动的規律，很快就会生出資本主义和資產階級来，而絕大多数入則是破产，重新陷入被压迫被剝削的地位。这条路是絕對走不通的；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农得到解放的唯一道路，只有无产階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就是說，不是实行什么絕對平均主义，而是实行生产資料公有制。

絕對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只能起反动作用

絕對平均主义的客觀作用是怎樣的呢？这要从一定的历史条件来看。在剝削階級的社会里，以小生产为基础的絕對平均主义，具有革命的与反动的兩重性質。例如在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中，农民的絕對平均主义就是这样。他們要求平分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財富，就这方面說是革命的、正确的。但是，他們还要求平分社会上其他一切階級、农民一切阶层和其他一切人的土地財產，平分工商业，这就是反动的了。因为这样平分的結果，將不是提高社会的生产力，而是使社会生产力倒退，它不仅不会使农民得到彻底解放，而且会破坏了爭取社会主义的實現，也就是远离开了彻底解放自己的道路。所以我們党在領導改革土地制度时，一方面坚决支持农民平分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財富的要求，領導他們去斗争、

去实现；一方面坚决说服他们不要要求平分一切物质生产资料。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绝对平均主义就只能起反动作用了。社会主义革命是要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在生活资料的分配上，实行“按劳取酬”的原则，即按着每个人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生活资料，而不劳动者则不得食。（当然，对于老年人、残废者等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是不在此例的。）分配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是唯一正确的原则。而绝对平均主义，则主张在分配上、生活上实行绝对平均，不管劳动的质量、数量怎样，劳动模范和懒汉，都享受一样的生活待遇。很显然，这是直接反对“按劳取酬”的原则的；也就是说，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它只能起反动作用了。

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行“按劳取酬”原则， 还不能消灭人们生活水平上的差别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非实行“按劳取酬”的原则不可呢？不管劳动怎样，实行平均分配，不是更平等吗？不。“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其实也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并不是人们愿意怎样分配就可以怎样分配的。第一，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还不是很高的，生产出来的物品，还不能满足每个人的生活需要；第二，由于旧社会遗留下的深远影响，

在人們腦子里還有資本主義思想殘余，社會上還有少數懶漢，還有人不願意積極勞動。你想，若是不管勞動怎樣，實行平均分配，不是有利於懶漢嗎？客觀上不是提倡懶惰嗎？那樣不就會破壞生產嗎？很显然，實行“平均分配”，不是推動社會前進，而是拖着社會倒退的。而實行“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却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結合了起來。一個人好好勞動，努力生產，增加了社會財富，也同時增加了個人和家庭的收入。勞動好，生活就改善得好些。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才能迫使地主、富農、資本家以及懶漢二流子參加勞動生產，在勞動中改造自己。很显然，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只有實行“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才能提高社會生產力，把社會推向前進。

有人這樣想：譬如兩個人勞動能力相等，一個子女少些，另一個子女很多，這樣豈不是一家生活得好，一家生活的不好、甚至生活得很不好嗎？難道這不是不平等嗎？是的，這樣兩個家庭，生活水平是一定有差別的；但是，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這是不能絕對避免的現象。正因為如此，所以共產主義者並不以為實現了社會主義就是達到了最終目的，而要繼續推動社會前進，實現共產主義。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對於積極勞動、因子女多或其他原因家庭生活不好的，對於喪失勞動力的，要由社會互助予以救濟，幫助他們保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而不能實行平均分配。當然，這樣在生活水平上還是會有一些差別的。這個問題，只有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才能得到徹底解決。在共產主義社會里，生產力高度發達了，生

产出来的物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以完全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了；人们都已经和资本主义思想残余彻底绝缘了；由于全盘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笨重的体力劳动没有了，劳动对于所有的人都成了如同体育、文娱活动般的需要了。那时就可以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了；也就是说，到那时候，生活水平上的差别就消灭了。由此可见，我们现在承认人们生活水平上的某种差别，正是为了消灭这种差别创造条件。生活的辩证法就是这样，这是不能随着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这里还应该说明白，就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也决不能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我们所说的是那时候消灭了生活水平上的差别，而不是生活上的一切差别。这是因为人们的口味和日常生活中的需要，并不是一样的，就是生活用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也不能不管个人生活需要上的差别，实行绝对平均分配。

绝对平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根本敌对的

绝对平均主义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敌对的；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说来，任何时候都是不需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严厉地批判过这种思想了。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很清楚的阐明。他说：“……这些人以为社会主义要求社会成员的需要和个人生活都是平均的，相等的，一律的。不用说，这种设想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所了解的平等，并不是个人需

要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平均，而是階級的消滅。這就是說：(甲)在推翻和剝奪資本家以後，一切勞動者都平等地擺脫剝削而得到解放；(乙)在生產資料轉歸全社會公有以後，對於大家都平等地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丙)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勞動的平等義務，一切勞動者都有按勞取酬的平等權利（社會主義社會）；(丁)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勞動的平等義務，一切勞動者都有各取所需的平等權利（共產主義社會）。^①在我們的國家里，斯大林所說的前三項都已基本上實現了，勞動人民都在興高采烈，在共產黨領導下為固執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生產、為將來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這時，追求資本主義剝削的資產階級右派，唱起絕對平均主義的曲子，污蔑社會主義制度，其卑鄙的目的，難道還不是十分明顯的嗎？

**資產階級右派並不是平均主義者，
他們只是利用絕對平均主義進行煽動**

眼前的事實告訴我們，絕對平均主義成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瘋狂進攻的武器。這並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於絕對平均主義是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其實，資產階級右派並不是什麼平均主義者，他們所要求的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剝削工人，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資本家獨占；也就是極端的不平均。資產階級的“宣傳家”，在過去，在他們掌握着生產資料對工人進行殘酷剝削的時候，是慣於把

^① “斯大林全集”第13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13——314頁。

絕對平均主义加到社会主义的头上，然后大肆攻击的。他們造謠說：社会主义是主張絕對平均的啊，对所有的人，不管男人和女人，不管老人和小孩，不管人們的胃口，发給一色的一样大小的衣服，发給一样的同量的口粮，一点也沒有自由啊！可是他們現在却忽然主張起絕對平均主义来了。这是什么緣故呢？很显然，他們是利用絕對平均主义，对小生产者，对具有絕對平均主义思想的人进行煽动；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合理的生活上的差別，說成不平等，等級制度，以攻击我們的社会。右派先生們，你們是主張的怎樣的“平均”啊？难道不是你們自由发财，而使劳动人民陷入被压迫被剝削的地位嗎？很清楚，他們要求的并不是什么“平均”，而是煽动一些人起来反对社会主义，以遂他恢复資本主义的愿望。这本是很明白的事情，但是具有絕對平均主义思想的人，却看不清楚，以至糊里糊涂地随声附和起来。

当然，我們不是說：凡是有絕對平均主义思想的人，都是反动的，都是右派分子；但是絕對平均主义确是反动思想，确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确是資產階級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武器。如果有絕對平均主义思想而不克服，那也是很危險的，特别是对于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說来，更是十分危險的。

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絕對平均主义常常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現，如不克服是非常危險的

我們說过：絕對平均主义是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农的一种

幻想。在實現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以后，他們之中有些人，还是有这种幻想的。但是，对于劳动人民說来，尤其是半无产者——貧农，說服他們，克服这种思想，并不是太困难的。这是因为他們是爱劳动、十分厌恶懶汉二流子的；他們在旧社会里，受着殘酷的剝削和压迫，他們的劳动成果大部分被剝削階級剝削了去；所以只要對他們把道理講明白，他們就乐意接受“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則，放棄絕對平均主义的幻想。合作社的社員大多数拥护“按劳取酬”的原則，就是証明。但是未經改造的小資产階級的知識分子，却頑固的要求絕對平均主义。这是因为他們在旧社会的生活是接近上层的，他們是在資产階級的学校里受教育，由資产階級的原則教养起来的，他們的世界观是資产階級的世界观，他們有濃厚的个人主义，有濃厚的知識分子、精神劳动的优越感……；如是等等。在他們那里，絕對平均主义和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結合了起来，所以就成了很頑固的东西。他們总是过高估計自己的精神劳动，总觉着自己吃了亏，付給社会的劳动太多了，从社会取得的太少了。但是，他們却不和体力劳动者比較，他們認為体力劳动的貢獻是微不足道的；而專和待遇比他們高的人比較，所比較的又不是劳动，不是对社会的貢獻，而只是待遇。所以，他們的絕對平均主义的要求，实际上常常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現。他們吝惜自己的劳动，却要求享受最高的待遇。于是，他們就不滿“按劳取酬”的原則，而主張絕對平均。他們看到对社会貢獻大的人、生活高过他們，就不舒服；我們認為是合理的，他們却

認為是不平等。例如高級領導人員、高級科學技術人員工資高些，他們就反對，他們要求從生活上與高過他們的人平均起來。他們看到國家給予高級領導人員、高級科學技術人員某些必要的工作條件，他們享受不到也眼紅，以至咒罵。他們認為這是特殊待遇，應該取消。總之，他們要求不管人們的勞動對於社會的貢獻如何，不管工作需要如何，在“物質享受”上必須絕對平均起來；而他們又是專和勞動能力高過他們的人比較享受的。於是，就用絕對平均主義作尺度量我們國家的工資制度、生活待遇以及對各級幹部的工作條件的規定；由此，他們就得出了一個“不平等”的概念，而牢騷滿腹。很顯然，這樣就與黨和社會主義對立起來了。輕則被右派分子所迷惑，附和右派分子的論調；而嚴重起來就會墮落成右派分子。黨內出現的右派分子，有一些就是這樣變成右派的：他們有極端個人主義和絕對平均主義，用絕對平均主義的眼光，觀察我們社會和黨內的生活，於是就說在新社會里，在我們黨內形成了“新的等級制度”、“等級主義”。他們由此向社會主義舉行瘋狂的進攻，而成了可恥的叛徒。

由此可見：我們說，絕對平均主義是一種很危險的思想，決不是過甚其辭。由此可見：我們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堅決地徹底地克服絕對平均主義思想。

（寫於9月2日）

斥資產階級右派的詭辯論

—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同志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演以後，有一批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忽然一下子成了“辯證法”家，似乎只有他們才懂得辯證法，而共產黨員却成了頑固不化的形而上學者。難道事情會真的這樣奇怪嗎？當然不會的。眼前的事實，又一次生動地證明了這個真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是工人階級的精神武器，只有站穩工人階級立場的人，才有可能真正地掌握它；而一切反動階級和革命的辯證法是絕對無緣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所玩弄的把戲，是用反動的詭辯論偷換革命的辯證法，借此招搖撞騙，迷惑羣眾，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開辟道路。等到他們的政治陰謀敗露，受到廣大人民的義正辭嚴的反擊以後，又無恥地將詭辯論加于共產黨的身上，惡毒地誣蔑黨“出爾反爾”。右派分子的政治陰謀現在已經是路人皆知的了，然而根本相反的詭辯論和辯證法却有某些表面上的相似，這就不是每個人都分辨得清楚的。因此，對資產階級右派的詭辯論，還有從理論上加以批判的必要。

二

資產階級右派，對古老的詭辯論的命題，例如“鷄三足”^①、“卵有毛”、“阿基列和龜”^②之類，是沒有興趣的。他們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陰謀家；所以他們的詭辯論，也就集中在國家當前的重大政治問題和政策問題上。

資產階級右派的根本目的，是篡奪國家的領導權，復辟資本主義。他們從“匈牙利事件”中得到了鼓舞，於是，就企圖煽動人民鬧事，在我國製造“匈牙利事件”，從而渾水摸魚，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民主專政政權。因此，他們的詭辯論，就首先集中在鬧事問題上，用詭辯論偷換辯證法，裝成“辯證法”家的樣子，宣傳鬧事是好事，為製造中國的“匈牙利事件”开辟道路。

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認為：對立的東西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壞事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轉化為好事的。否認這一點，就是形而上學。但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這裡最重要的是：第一，說的是“轉化”，在對立的東西之間、好事和壞事之間是有嚴格的界限的。“是”可以轉化為

① 這是先秦公孫龍的命題，其論證曰：“謂‘鷄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通變論”）

② 這是古希臘蘭諾的命題。阿基列是有名的賽跑家。蘭諾的命題，“證明”阿基列永遠追不上爬行的烏龜：假設阿基列的出發點距龜的出發點為一百步，他比龜快十倍；阿基列走十步，龜前進一步，阿基列走一步，龜走十分之一步……，這樣永無終結，阿基列永遠追不上烏龜。

“非”，但“非”却不是“是”。好事和坏事是可以相互轉化的，但好事并不是坏事，坏事并不是好事。第二，是“一定条件”，对立的東西相互轉化是有一定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即：在一定条件下才会相互轉化。如果，在这里再向“前”走一小步，似乎是更“彻底”一些，就变成了詭辯論。例如，先秦名家惠施的有名的詭辯論命題——“卵有毛”：鷄(或其他鳥類)是从卵孵化出来的；鷄有毛，因此卵也是有毛的。这就完全否定了事物的質的規定性。卵包含有可以轉化为鷄(包括毛)的因素，然而鷄和卵是有确定的質的区別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适当的溫度)，卵才能轉化为另外的東西——鷄。詭辯論的荒謬，在这里是十分明显的。而右派分子，正是玩的这样荒謬的把戏。

毛澤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講演中，应用馬克思主义的辯証法，对“鬧事”問題是分析得十分清楚的；正是这种深刻的辯証法的分析，使我們認清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少数人鬧事的原因何在？应该怎样对待鬧事？

他說：“1956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課的事件。这些人鬧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質上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鬧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鬧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他还指出：“应该承認：有些羣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

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長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很清楚，羣众鬧事的原因，除了官僚主义之外，从羣众方面說，也还由于他們有盲目性，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長远利益的关系，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小利益服从大利益、有领导、有秩序地稳妥地解决問題的道理。当然，毛澤东同志在这里并不是責备羣众，而是严格的要求领导，羣众的盲目性也还是由于对他們缺乏思想政治教育。經過这种冷靜而深刻的分析，就避免了把人民內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的危險，把少数羣众盲目鬧事看作反革命事件而加以鎮压的危險；給人們指出了應該如何去对待鬧事的正确途徑。

應該怎样对待鬧事呢？毛澤东同志明白地指出：“我們是不贊成鬧事的，因为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去解决，而鬧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損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这个問題上，我們应当注意的是：（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鬧事的原因，必須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二）如果由于我們的工作作得不好，鬧了事，那就应当把鬧事的羣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鬧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羣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沒有解决的問題。”請看，对于怎样对待鬧事問題，不是講得十分明白嗎？

毛澤东同志还指出：“……在我們的社会中，羣众鬧事是坏事，是我們所不贊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

促使我們接受教訓，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羣众。从这一点上說来，坏事也可以轉变成成为好事。”“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它也有二重性。由于匈牙利的同志們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間处理得正确，結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轉变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現在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陣营各国也得了教訓。”在这里，是多么深刻、生动而清楚、明白的辯証法的分析！这种分析，正是教导我們：“学会全面地看問題，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結果”，从而去正确地發揮主观能动性。

請看，毛澤东同志的分析和敘述，不是十分明白嗎？就是一个心地正直的中学生，虽然他不懂得什么叫辯証法，不明白对立物相互轉化的哲学道理，也决不会誤会成鬧事是好事、人們應該提倡和鼓励鬧事的。

可是資产階級右派，却利用詭辯論作起文章来了。你們不是說：可以“利用鬧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羣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沒有解决的問題”嗎？可見鬧事是有好处的啊，是好事啊！你們不是說：“匈牙利現在比过去巩固了”嗎？可見匈牙利事件有好处，是好事啊！这是明显的違背常識的詭辯。鬧事是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轉变成好事；这里的“一定条件”就是正确的領導和处理，就是“把鬧事的羣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如果处理得不正确，那末，坏事只能是坏事，决不能轉化为好事，而且会从小坏事发展成大大坏事。所謂“利用鬧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羣众的

一种特殊手段”，这是指的在已经发生了闹事的情况下，领导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决不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非闹事不可，不闹就不能解决问题；也决不是说闹事在沒有正确领导和处理的条件下会转变成好事的。说闹事在正确领导和处理下可以转变成好事，也决不是说闹事本身就是好事。“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从根本上消灭闹事的原因”。至于“匈牙利事件”，那更是非常明显的。毛泽东同志明明白白地说：“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間处理得正确，结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转变成了一件好事。”这里說的是“结果”，說的是“转变”；并且說的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的转变。很显然，“匈牙利比过去巩固了”，这件功劳是記在“匈牙利的同志们”的正确处理的賬上；而决不能記在闹事本身的賬上。匈牙利事件，是羣众的盲目行动被反革命利用而轉化成的反革命事件，如果不是匈牙利同志们处理得正确，那么社会主义制度就会被反革命顛复了，那还会起什么好的作用呢？就是由于匈牙利同志们正确处理 and 斗争，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得到了巩固，而这事件，給匈牙利的社会主义事业也还是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的。不但有重大的经济損失，而且匈牙利人民是付出了鮮血的。这里，有着深痛的教訓。人民接受了深刻的教訓，这是好事；这难道不是人民羣众从实践中懂得了闹事是坏事，才引出了好的结果嗎？闹事本身怎么能够說是好事呢？

右派分子提倡的决不是什么辯証法、全面地看問題，而

是絕對的相对主义，好事无条件的会起坏作用，坏事也无条件的会起好作用；因此好事就是坏事，坏事就是好事。这正是为他們提倡鬧事、制造鬧事找寻理論根据；企图解除我們正确处理少数羣众鬧事的精神武裝。

三

資产階級右派的詭辯論，还集中在对于“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曲解上。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其目的是为了“促进我国的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是为了“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而資产階級右派却要利用并曲解这个方針，为毒草扩大地盤，以便利他們的政治阴謀活动。在毛澤东同志作講演以前，确实有不少同志不理解这个方針的正确性，他們对这个方針表示怀疑。其根源主要是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学，不了解科学和艺术发展的規律性，不了解矛盾斗争的辯証法，害怕毒草放出来无法收拾。毛澤东同志的講演，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規律，从矛盾斗争的辯証法，对“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作了深刻的說明。毛澤东同志說：“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問題，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討論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决。”“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細致的講理的方法。”显然，这里是說的根据艺术、科学发展的特点，思想問題的特点，去进行斗争，解决矛盾；这里，說理的斗争是絕對的，对毒草作斗争是毫不含糊的。

毛澤东同志还根据当时有些干部的錯誤看法指出：不要害怕毒草，“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們的批評中間，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間，鍛煉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陣地”，“实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并不会削弱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領導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他还指出：“資产階級、小資产階級，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用各种办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要他們不反映不表現，是不可能的。”但是，同时他也指出了“毫無疑問，我們应当批評各种各样的錯誤思想。不加批評，看着錯誤思想到处泛濫，任凭他們去占領市場，当然不行。有錯誤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我們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們必須謹慎地辨別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

很显然，你站在无产階級的立場上，就要力求放香花，和毒草作斗争；你站在資产階級的立場上，就会力求放毒草，和香花、和真理作斗争。

資产階級右派用他們的毒草和香花、真理作斗争，首先是惡毒地曲解“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企图解除人們和毒草作斗争的思想武裝。这是毒草中最毒的毒草。

右派分子几乎无例外地否認“斗争”，要把“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方針中的斗争性抽掉。他們說，既然允許毒草放，既然毒草可以作肥料，那么毒草也是好东西，就不必強調和毒草作斗争。而当他們放出大量毒草，人們进行剷除的时候，他們就說党的政策变了，惡毒地污蔑党“出尔反尔”。很显然，

这完全是詭辯。固然，要毒草不放是不可能的，有資產階級存在，就会放出資產階級的思想毒草来。这是客觀規律。然而，对于培养香花的园丁說来，他們的任务不正是剷除毒草么？不錯，我們过去認為、現在还認為毒草可以作肥料；然而这一形象的說法，正是深刻地表明了辯証法。毒草可以作肥料，不言自明，当然是把它剷掉、漚爛，才变成肥料的。除了你們这些右派分子、詭辯論者以外，誰說过毒草就是肥料呢？这里你們是更“彻底”了一点：辯証法認為毒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轉变成肥料；而你們却說毒草就是肥料。我們說，不要怕毒草；而你們說，毒草是好东西，放吧，茂盛的生長吧。这样兩種立場、兩種說法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右派分子还提倡不可知主义，說毒草和香花是不可分辨的，香花也許有毒，毒草也許还香，你認為是毒草的，他也許認為是香花。于是，毒草和香花是沒有确定的界綫的，因而剷除毒草也是不可能的。这里，他們也是比辯証法更“彻底”了一些。我們認為艺术和科学中的香花和毒草，并不是很容易分辨的，“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錯誤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驗的时间”。但是，它們畢竟是有客觀的标准的。究竟是香花，是毒草，經過爭論，經過实践和实验，經過广大人民的抉擇，經過对客觀效果的檢查，就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而艺术和科学的政治标准，判断政治言論的标准，那更是明显的和确定的。难道違犯宪法的東西，还能是香花么？毛澤东同志所提出来的六条政治标准，已經是說得再清楚不过了。不錯，你認為香花的，他可能認為是毒草；“所謂香花和毒草，

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但是，哪是真的香花，哪是真的毒草，却不能以人们的主观看法为转移。资产阶级认为的香花，是真正的毒草，因为那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拖着社会倒退的，对人民有害的。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根据实践的判断所认定的香花，才是真正的香花，因为那是客观的真理，那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对人民有利的。不错，常常有这种情形：一部作品、科学论著，有是有非，有香花有毒草，我们应该仔细分析，保护前者，批判后者；然而是非，香花和毒草却还是有确定的界限的。很显然，在这里，辩证法所要求的是实事求是的分析，反对以偏概全，以局部代替全体；而右派分子却要利用这种复杂的情形，把人们引导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相对主义，削弱人们识别毒草和香花、判断是非的信心。

四

右派分子的诡辩，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不再一一细说。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右派的诡辩论的特征：（一）否定事物的质的规定性；（二）把对立物的相互转化说成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三）把矛盾的斗争说成是不重要的、或是不必要的；（四）提倡不可知主义，“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相对主义。而这些手法又是集中在当前最重大的政治问题上，为他们的政治阴谋服务的。

扼要说来，资产阶级右派的诡辩论就是如此。他们的诡辩，确是曾经迷惑了一些立场不稳、只懂得一些辩证法皮毛

的人。我們應該从这里接受經驗教訓。

馬克思主义的辯証法是无产階級的精神武器；在我們眼前发生的事实，又一次地生动地証明了这个真理。不站稳无产階級的立場，是絕對学不会馬克思主义的辯証法的。站稳无产階級的立場，当然还不等于掌握了和精通了辯証法，但是却有了掌握和精通辯証法的根本条件。因此，一个哲学工作者，以及每一个学习哲学的同志，都必须首先下决心解决自己的立場問題。我們看到有些人，立場問題沒有解决，虽然学会了一些辯証法的詞句，但是在这次同資产階級右派的斗争中，并没有更聪明一些、看問題更清楚一些；甚至在右派分子玩弄詭辯論的时候，有的比別人更糊涂一些。从这里，我們可以得到一点启示：哲学教育應該更加重視党性原則，帮助受教育者彻底解决立場問題。

革命的辯証法和反动的詭辯論，是根本对立的；但是，它們却有某些表面上的相似，从辯証法似乎是向“前”走一小步，就会落在詭辯論的泥坑里。讀过哲学史的人都知道这个有名的故事：赫拉克利特的学生克拉迪尔，由他的老师的辯証法走到荒謬絕倫的地步；赫拉克利特的命題是：“人不能兩次走入同一河流之中”，克拉迪尔更“前进”一步，他認為一次也不能走入同一河流，存在就象旋风，什么也不能区别。如果我們从教科書上讀到这件故事，并没有得到深刻的教益，那么，从当前的資产階級右派用詭辯論偷換辯証法的騙術中，應該深刻領会到：把辯証法和詭辯論尖銳明确的对立起来、区别开来，是何等重要；是怎样的似乎是从辯証法“前进”一

步，就变成了詭辯論。

在我国历史上，是有丰富的辯証法的傳統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有詭辯論的逆流。而且，因为古代的辯証法是不科学的，所以更容易稍微挪动一下，走到詭辯論。例如庄子从老子的辯証法走到絕对的相对主义，就是很值得玩味的。我認为，我們的哲学史研究工作，对历史上的詭辯論是批判得很不够的。詭辯論——例如庄子的相对主义哲学，在若干知識分子中还有影响。現在，詭辯論的階級基础、社会基础也还是存在的。因此，我認为繼續批判詭辯論，清除它的影响，以保卫革命的辯証法，是哲学战綫上的重要任务之一。

（写于9月8日）

何物“理性主义”？

“我們不承認任何种类〔的〕外界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要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要站到理性的审判台面前，或者辯明其存在的理由，或者放棄其存在的权利。思維和理性成了測定一切現成事物唯一的尺度。

——北京大学譚天榮”

我相信，有許多讀者讀了上面的話，會感到“似曾相識”；是的，這是從恩格斯的“反杜林論”第13頁上抄來的。恩格斯所寫下的那段話，是表述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的社會政治觀點的精神實質的；接着恩格斯就對之作了科學的批判。右派分子譚天榮斷章取義，把恩格斯表述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的社會政治觀點的話，抄在自己的旗幟上，把原句中的“他們”換成了“我們”；於是，小丑借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的在天之靈，變成了“偉大”的、我們這個時代的“理性主義者”、“啟蒙思想家”。然而，欺騙掩蓋不了事實，卑鄙無恥的小丑仍然是卑鄙無恥的小丑。十八世紀法國的偉大的啟蒙思想家，並不能為二百多年以後的中國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們分擔罪過。如果說在法國革命的前夜，偉大的啟蒙思想家播下的是“龍種”，那麼，落在譚天榮之流的腦筋里，生出來的却是“跳蚤”。

十八世紀的法國啟蒙思想家是偉大的；特別是狄德

罗、霍尔巴哈等人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发展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他们是战斗的、彻底的无神论者，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哲学遗产。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启蒙思想家们，在社会历史观点上却都是唯心的。他们考察社会问题，从抽象的人的“理性”出发，认为“理性”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判断一切事物的唯一尺度。实际上，他们所把握到的人是资产阶级的人，他们所说的“理性”，是资产阶级的“理性”，亦即资本主义的原则。他们正是代表了当时资产阶级的要求。但是，“当欧洲脱离中世纪的时候，向上发展中的城市资产阶级是其革命的因素。它在中世纪封建制度内所争得的公认地位，对它的扩张能力说来已经是太狭小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发展已经不能与封建制度并存了，因此封建制度必然要倾覆了。”^①因此，以资产阶级的理性衡量一切的启蒙思想家，虽然其社会历史的哲学观点是唯心的，错误的，但他们的政治观，在当时条件下，却是进步的、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种类的外界权威”，这里指的是封建的神权、皇权和教权。他们说：“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等一切都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要站到理性的审判台面前来，或者辩明自身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自己的存在”，乃是指的中世纪的教会，经院哲学、封建的社会、国家制度；总之，中世纪的一切，都要受“理性”（资产阶级的“理性”）的审判，都应该死亡；他们要绝对否定以往的一切，认为以往的一切都是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103页。

合“理性”的。他們所夢想的是“理性王国”。这个王国实现以后，“迷信、偏見、特权与压迫应当讓位于永恆的真理、永恆的正义，从自然界本身所产生出来的平等，以及不可剝夺的人权”；而“这个理性的王国，不是別的，正是資产階級理想化的王国”，永恆真理、永恆正义即資本主义原則，平等原則是在資产階級的法律面前平等，資产階級的所有权是最根本的人权之一。他們的“理性的王国”，即是資产階級民主共和国。①这是为他們的时代条件和階級地位所限制；他們不可能不站在資产階級的立場上看問題。但是，他們的矛头是指向封建主义的，是反对一切阻碍社会前进的势力和傳統的，所以他們是进步的革命的；他們的学說，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导言”。

現在，离开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时代，已經二百多年了。世界起了翻天覆地的偉大变化。我們看看二百多年以后的中国的小丑們——資产階級右派分子，蹈襲偉大的启蒙思想家的詞句，是玩的什么鬼把戏，他們的“理性主义”实际上是什么东西。

“理性的王国”並沒有給人类帶來較好的命运。資本主义給广大劳动人民、小有产者，帶來的是貧困、破产和无限的災难。正如恩格斯所說：“总而言之，‘理性的胜利’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表现出是对于启蒙学者所作的美好約言的殘酷的諷刺。”②历史的过程，把启蒙学者們远远的抛在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4頁。

② 同上書，第267頁。

后面了。

在启蒙学者之后的是圣西门、傅利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他们描述了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残酷、骯髒的现实，他们所追求的是社会主义；但由于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不成熟，所以不能不是空想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要建立理性的、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相较实有天壤之别。在他们看来，根据启蒙学者的原则而建立的资产阶级世界同样是不合理的，不公正的；所以应该和封建制度及一切以前的社会形式一样的被抛到垃圾箱里去。真正的理性与真正的正义之所以迄今尚未统治世界，其原因只是在于它们还没有被人们所正确认识。”^①他们所说的“理性”已经不是资产阶级的“理性”，而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平等”的“理性”。但是，他们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不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把他们的理想的实现，求助于抽象的“理性”，寄托在说服立法者身上。这当然是错误的。然而，空想的社会主义者的“理性王国”，较之启蒙学者的“理性王国”，却是伟大得不可比拟的。

随着历史的前进，空想的社会主义也被远远地抛在后面了。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尖锐化，无产阶级已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自然科学出现了三大发明；哲学经过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阶段——无产阶级的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科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页。

学和哲学的成果和当代自然科学的成就，集中了无产阶级的智慧，完成了一个思想上的大革命；他们创立了真正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真正科学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从而也把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到了科学的社会主义。从此，社会主义再也不是建筑在什么永恒的“理性”的基础上，而是从社会发展规律、从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科学的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死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的发现，代替了抽象的“理性”。并且，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以及无产阶级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的战略和策略的基本原理。这个科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从此以往，不仅启蒙学者的“理性主义”，就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性主义”也成了过时的东西，只有我们在探讨哲学史和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的时候，才必然提到他们；当然，就他们的时代说来，他们是伟大的，他们曾经启发过人们的心智，曾经起过进步的革命的作用。从此以往，如果谁拿出启蒙学者或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抗，那就只能是反动的了，因为那是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拉着科学和社会倒退的。

从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来，世界又经历了暴风雨般的变化，帝国主义代替了自由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代替了平稳的发展。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俄国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的领导下，首先推翻了资本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从此社会主义不仅是理想，而且变成了现实；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了照耀

全世界的灯塔，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榜样和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和亚洲有许多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现在，社会主义已经在世界三分之一的土地上胜利了。而在另外地方，资本主义也快要进入坟墓了。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正在蓬蓬勃勃的发展；我们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取得了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我们的祖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我们的人民正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胜利了，它已经成了国家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建立了起来；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它只剩了一条尾巴。中国人民为自己的胜利而兴高采烈；各国无产阶级也为我们的胜利而欢呼。正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右派的“哲学”小丑，蹈袭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词句，把自己打扮成“理性主义者”，用他们的卑鄙的“理性”审判“现存的一切”，否定“现存的一切”。如果启蒙思想家泉下有知，他们将是怎样唾弃他们当年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不孝子孙呢？小丑们，恶毒地污蔑了现在，也恶毒地污蔑了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

小丑们要重新审判、全盘否定的是什么呢？很显然，他们要重新审判和全盘否定的不是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在我们的国家里已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彻底否定了；也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我们国家已经被无产阶级革命基本上否定了，并且在被继续否定着。在我们国家的现阶段，

正的方面是社会主义，这是最基本的现实；負的方面是资本主义残余和资产阶级思想，这是生活中的次要的、非主导的方面。我国人民正在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下把这个革命继续推向前进。而右派分子，却要用他們的“理性”来否定社会主义，来否定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所造成的一切。他們所說的“不承認任何种类的外界权威”，乃是指的不承認无产阶级專政的“权威”，而为恢复资产阶级專政的“权威”，实际上也就是为恢复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权威”开路。正告右派分子：无产阶级專政的“权威”，必須巩固，这是因为在国际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他們时时刻刻地想侵略我們；在国内还有反革命，还有资产阶级右派企图兴风作浪，推翻社会主义，我們决不允許右派分子把祖国拖回殖民地的道路；所以必須繼續巩固这个“权威”。讓他們望着这个“权威”头疼吧！他們所說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等一切都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乃是指的科学的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乃是指的馬克思列宁主义，乃是指的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專政的国家制度……，簡言之，一切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思想，都应当在他們的“理性”审判台前，受到最无情的批判，都应当彻底否定，而恢复资本主义——也就是恢复殖民地的旧中国。事实告訴了我們正是这样，右派分子要否定五大运动（土地改革、鎮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大改造（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否定人民民主專政政权，要否定无产阶级——共产党的领导权，要否定馬克思列

宁主义……。右派分子，有些并没有说出他们的“哲学”，然而他们实际上却是这样做的：用他们的卑鄙的“理性”，否定社会主义的一切。

小丑的“理性”究竟是什么东西？当然，他们的“理性”就是资产阶级的“理性”；不过，外表的相似，却不能证明他们的“理性”就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理性。启蒙思想家代表了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他们的“理性”是当时资产阶级的进步性、革命性，他们正是用这作为审判“现存一切”的尺度，用这来否定封建主义的东西的。虽然，他们受着资产阶级的阶级性的局限，在不同程度上害怕群众，害怕群众的轰轰烈烈的“暴动”，然而，在当时条件下，他们毕竟是伟大的。而小丑们的“理性”，不是别的，乃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性，这就是他们“衡量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尺度”。于是，他们衡量的结果是：社会主义的一切都应该打倒，资本主义一切都应该恢复。

有人说：这是“死的抓住了活的”，不对，完全不对。对于右派分子说来，这个公式是不适用的。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理性主义，早已过时了；但是，小丑们并不是被它抓住的，小丑们一丝一毫的那种“理性”也没有；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进步思想传统和他们是无干的。他们只能糟蹋这些东西。他们踏袭启蒙思想家的词句，不过是一种骗术。

普列汉诺夫，关于法国启蒙思想家曾经写道：“……当时的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因此是可以有高贵的感情的。资产阶级，或者说它的最优秀的信徒们、那些有热忱和理智的

人，用霍尔巴哈的一句話來說，‘那些深思熟慮的人’，夢想着一個理性的國度，夢想着一種普遍的幸福，夢想着地上的天國。他們能夠不厭惡自己的社會趨勢所引起的那些不可避免的後果嗎？他們能夠不因厭惡那些後果而陷於自相矛盾嗎？我們讓一個年青、漂亮的姑娘看一看一個年老、丑陋骯髒、因老病而駝背的女人，她會大驚失色。”^① 啟蒙思想家和右派小丑們，一個是在天上，一個却是臭茅廁里的蛆蟲。啟蒙思想家為他們的時代局限，看不到資本主義王國的“後果”，小丑們看到了，小丑們正是欣賞這些卑鄙污濁的“後果”，要恢復的追求的，也正是這些東西，他們的靈魂和情感，除了極端的自私自利以外，什麼也沒有。

十八世紀法國的啟蒙思想家，用他們的“理性”——資產階級的革命性、進步性，來否定封建主義的一切；而右派分子，則用他們的“理性”——資產階級的極端反動性，來否定社會主義的一切。踏襲啟蒙思想家的詞句的小丑們的“理性主義”，其實就是這樣。

啟蒙思想家是十八世紀的清道夫；右派分子却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垃圾。詞句的假面，掩不住丑態和罪惡；小丑譚天榮倒是道出資產階級右派的“哲學”秘密：他們所要的哲學，不管是什麼形式，實質上只能是反動的，他們要從哲學史中尋找的只是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反對真理，反對一切進步東西的精神武器。

（寫於9月8日）

^① “唯物論史論叢” 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5——36頁。

反抗精神、叛逆性格及其他

反抗精神

在不少人的观念里，压迫是和丑恶、反动、渺小联系在一起，反抗是和庄严、正义、伟大联系在一起的；于是形成了一个“反抗精神”的抽象观念：反抗就是正义和伟大的化身。形成这种观念是有历史原因的。在几千年的阶级社会里，直到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一般说来，压迫者是一小撮反动剥削集团，他们拖着历史倒退，对广大群众实行残酷的压迫；反抗者是人民群众，他们推动历史前进，对反动集团的统治无畏地进行反抗，他们表现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伟大英雄气概。在这种情况下，压迫确实就是丑恶、反动和渺小；反抗确实就是庄严、正义和伟大。社会主义革命到来了，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事情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时，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群众对敢于向革命实行反抗的分子实行压迫，和过去反动统治对人民群众一样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只许规规矩矩，这叫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过有一点是不同的，只要他们幡然悔悟，还是给他们以重新做人，并享受新社会幸福的机会的。而失去了统治地位的反动阶级总是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要拚命反抗。于是，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压迫”和“反抗”互换了位置，压迫者是广大人民群众，反抗者是一小撮死不悔悟的反动分子；反抗再也不是庄严、正义和伟大，而是真正的丑恶、反动和渺小，因为他们反抗的是人民群众的天下，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如同妄想撼大树的蝼蚁。“反抗”等于正义和伟大的旧观念，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是完全不适用了。看来，这道理是并不难明白的。

但是，有些熟读历史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却是糊涂的。他们钦佩并且要效法古人的反抗精神，这是好的。但是，他们不读“活历史”，不看“活条件”，于是对他们所佩服的古人的英雄气概来一个非科学的抽象，曰：伟大的反抗精神。而把生动的内容，反抗的什么，对谁反抗，一概给抽掉了。剩下的是万古不变的反抗，反抗的矛头指向那里，在所不问。其实，就是不說现在，我们返回到历史实际，也不难明白这种抽象是唯心的。谁对那一辈古人，只钦佩他“反抗”，而不问他“反抗”的是什么呢？我们钦佩文天祥、岳飞、史可法等人，是因为他们反抗的是异族侵略。对于“大小三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的“反抗”只是嗤之以鼻，就因为他与人民为敌，他是勾结异族侵略者的祖国叛徒。其实，古人对这一点也是有原则的，他们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见那原则就是“为玉”还是“为瓦”的问题。今天是“玉全瓦碎”的时代，“瓦”要“碎”，有什么伟大之处呢？

右派分子在向社会主义进攻中，就用抽象的“反抗精神”来迷惑青年。他们做了一顶“花冠”，上边题着一行大字曰：

“偉大的反抗精神”。有些閱歷淺、讀書太死、立場模糊的青年，竟把这頂“花冠”接过来戴在自己的头上，心目中想象着某一輩勇于反抗的英雄，于是“飄飄然”起来，进一步就“昏昏然”地反抗一切。矛头指向那里？他們心灵中沒有这个问题；这样也就被右派分子牽着鼻子走了。但是，右派分子的心里却是雪亮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盲目的反抗一切，自然是要指向共产党的領導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右派分子在青年中慣玩的花招之一，是向青年阿諛奉承；之二，就是欺負青年人年青，不知道他們的历史，而把自己打扮成“英雄”。向青年献“反抗花冠”的右派分子，真的是“反抗”英雄嗎？查查他們的历史就会曉得：在民主革命中他們是走第三条路綫的，他們是“宁为瓦全，不为玉碎”的，有的曾經无恥地仰人鼻息，奔走于蔣家权貴之門，有的經常向反动派送秋波，討价还价。例如，罗隆基就說过：“美国买馬买錯了，如果把給蔣介石的錢的十分之一拿給民盟要好得多。”原来，他們自認為自己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馬”，埋怨主子的是“买馬买錯了”，而要趁此机会廉价拍卖的。这批反抗的“英雄”，那时，他們的“反抗精神”那里去了？他們現在把自己說成反帝反封建的反抗英雄，那是昧着良心，盜窃了左派朋友們的功績的。他們对于社会主义有反抗精神，那倒是的确的。然而，他們还愿意把“反抗英雄”的“花冠”送給青年，那是要青年为他們“火中取栗”的。青年人應該从这个风浪中接受教訓：无产阶级提倡和贊揚的是对于反动压迫的反抗，这是真正偉大的反抗，因为这种反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反动阶级提倡和贊揚

的是对于历史車輪的反抗，这是卑鄙的、渺小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目标地盲目地反抗一切，却只有落到右派分子的罗网里去。

不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还有缺点，也还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这样的坏东西。对于这些，我們是要坚决反对的。但是，在我們的国家里却没有一个自上而下的力量，压在人們的头上，不准反对；相反的，倒是党和国家号召、支持、組織人民羣众来反对这些东西。我們的缺点、錯誤，正是靠着党和国家自上而下的領導和支持，与广大人民羣众自下而上的批評和监督，有秩序地有步驟地去克服的。

叛逆性格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統治的觀念是把忠君、忠于地主階級、忠于封建傳統觀念叫作忠貞的；而把对于这些的反抗叫作叛逆，大逆不道。封建社会瓦解了，人們和封建傳統觀念断然地决裂了；有些出身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叛变了自己的本階級，站到人民的行列中来，于是叛逆性格在人民的眼目中成了偉大的。在資本主义的殒落时期，也发生了出身資产階級的知識分子叛变本階級的事实，这当然是偉大的；无产阶级欢迎他們站到自己的行列中来。而坚持資产階級立場的分子却是恨之入骨；他們自己是宁肯做祖国的叛徒，也不肯向无产阶级、向真理和正义屈服的。这时在他們的眼中：叛变資产階級是最可恥的，只有为了他們狹隘的階級利益而叛变祖国，才是“荣誉”和“偉大”。

叛逆性格是偉大还是渺小？是荣誉还是可耻？全在于：“叛”的是什么？“逆”的是什么？“叛”的是正义和进步，“逆”的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那是非常的渺小和可耻；“叛”的是反动集团，“逆”的是反动潮流，才是真正的偉大和可嘉美的荣誉。实际存在的是什么人对于什么的“叛逆”，抽象的“叛逆”是没有的。

要学习前人的“叛逆性格”，你学的是那一种“叛逆性格”？是学习鲁迅先生？还是学习写过“赤区归来记”的楊邨人？

偉大的鲁迅先生，从“旧营壘中来，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牛鬼蛇神之輩把他恨透了。当时有一家报纸载起“文坛二臣傳”来，第一个就是鲁迅先生。那意思是罵鲁迅先生大逆不道的。然而，鲁迅先生对于“二臣”这个徽号却是乐于接受的。他說“……二臣之說，却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試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誹，‘臣罪当誅今天皇圣明’，腹誹就决不是忠臣的行徑。”

（“二心集”序）并且，他还拾了这个由头，把自己的一本杂文集題名为：“二心集”。是的，鲁迅先生和牛鬼蛇神之輩是兩条心，然而他和人民却完完全全的是一条心。

可是，也有另外的一种“叛逆性格”，楊邨人就是一个典型。这是被鲁迅先生口誅笔伐过的。楊邨人輩是真正的人民的可耻叛徒，历史判定了他們不过是“蔣記”的一条走狗而已。

何种叛逆性格好，何种叛逆性格坏，工人阶级和右派分

子，心里都是明白的；惟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糊涂。右派分子，赞扬的是对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叛逆，他们把这种人的行径叫作“起义”——对于明白人来说，“起义”在这个场合是一个多么可耻和恶毒的字眼啊！工人阶级却认为这种叛逆是卑鄙的可耻的；而认为只有符合历史规律要求的，叛逆自己出身的反动阶级，站到人民、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才是光荣的、伟大的。浸透了资产阶级的“超阶级”毒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是糊里糊涂地认为一切叛逆皆好，这会被右派分子刮起的邪风吹到那里去呢？

右派分子利用某些青年人的弱点，用“叛逆性格”的闪光词句诱骗青年；他们故意不来区分是对什么的叛逆，他们晓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在青年中煽动起“叛逆性格”的狂热，是不难被他们引到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去的。这是一个毒辣的圈套。一时上当的青年，想想自己的言行，在客观上起了什么作用，大概是不寒而慄的！

大胆的独立的自由的思想

船夫抛弃罗盘，说这是思想解放，是独立和自由；你怎么评价呢？这样的船夫，他们觉得自己是独立自主的，自由的，然而他们却是被海浪推着走，他们何尝有独立，有自由？

不管目标，只是反抗，不管阶级不阶级，只是要叛逆性格，那和“勇敢”的抛弃罗盘的船夫一样，是危险得很的！

有人听到了同辈青年的议论，虽然不赞成，甚至对议论本身是反对的；然而，却佩服发议论的人敢于大胆的独立的

自由的思想。这未免过分天真了。独立、大胆到不要罗盤，岂不是呆？他被右派分子煽起的邪风吹到了极危险的地步，眼看要被暗礁撞翻，你不引为教训，反而有所佩服，这怎么说呢？如果他本人就是右派分子，恶毒地向社会主义进攻，你还佩服他大胆，岂不是佩服他恶毒得大胆，进攻社会主义的疯狂吗？岂不是给右派分子喝采吗？这大概是天真的青年人始料所不及的吧？

敢于大胆地独立地思想，是青年人的朝气表现。然而，不要罗盤，大胆就变成了盲目，独立思想就变成了胡思乱想，伟大的抱负就变成了狂妄。“走啊！追求啊！”主观愿望也许是追求真理，抱负是巨大的，勇气是十足的，然而，在阶级斗争的、政治的大海里，盲目的乱撞，会被巨浪冲到那里去呢？

在政治斗争中是这样；在做学问上也是这样。大胆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惟独对自己的怀疑和否定不加怀疑；抛弃前人的成果，抛弃那已经为实践确切证明的真理，而“独立”思想，那结果只能是一场悲剧，只能是对于追求真理和独立思想的讽刺。不错，大科学家都是勇敢的，他们不为已有的观念所束缚，结果发现了前人所未发现的真理；但是，他们无例外地是在前人已经达到的基础上，经过脚踏实地的艰苦工作，做出来的。心血来潮、偶然刺激的灵机一动，是做不出科学事业的。科学只是给老老实实的苦干的人开着大门的。例如大科学家牛顿，有些人惊叹他的成就，然而却只是咀嚼那个传奇式的苹果落地的故事。英国人，时时把那苹果

樹指給好奇者賞識，在那株樹死了之後，還砍成若干塊，作紀念品保存；他們是那樣看重蘋果落地的故事，似乎牛頓成功的妙訣，全在這裡。蘋果故事的咀嚼者們，夢想有一天早上會有一個什麼東西掉下來砸在自己的頭上，因而不費力的發明出比牛頓的理論更偉大的理論，成為當代第一等大科學家。然而，科學和這種異想天開的人，是無緣的。不錯，蘋果落地，以及把一桶牛奶用力從頭上轉過、而牛奶不落下來的事實，曾經引起牛頓的思考，然而，是經過多少年的艱苦研究，才寫就了他的“格物原理”啊！這位大科學家臨危的時候，虛心中肯地說：“如果我所見的比笛卡爾要遠一點，那是因為我是站在巨人的肩上的緣故。”

偉大的抱負是可嘉勉的；然而，如果不和謙虛、老老實實地工作結合起來，那會變成狂妄。要推翻前人的一切成就，凭着幻想發明一套“新理論”，那狂妄就到了愚蠢的程度。那樣，將不僅是白白犧牲自己的大好年華，而且會被邪風吹到極為危險的道路上去。

要有偉大的抱負，但更要腳踏實地的工作和學習；而且時時刻刻要象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有一分熱，發一分光”。

（寫於6月28日）

附 录

說 “稜 角” ①

这是五、六年以前的事了：有一位文艺界的朋友，把他的一部小說原稿拿給我看，要我提点意見。对文艺創作我是外行。記得当时只提了这末一点意見：“人物，最好更有角有稜一些。”我所說的有角有稜，意思是：一、个性要鮮明；二、正面人物，不要写成一“出生”就沒有缺点，现实中的英雄人物都是在克服缺点中成長起来的。当时那位朋友說：“我可不敢那么写”。原来当时“无冲突論”很流行，据說不兴写缺点，尤其不兴写英雄人物身上有缺点。“无冲突論”早已經被吹得烟消云散了；这在文艺創作上早已是不成問題的了。可是，据說現在有不少的青年人，立志要作“有角有稜”的人物。这可真是把我搞糊涂了。

“有角有稜”是什么意思？要是和我說的意思一样，要立志作“有角有稜”的人物，可大成問題。按我的第二层意思推度，所謂作“有角有稜”的人物，就是作有缺点的人物，或是

① 这篇文章是在三月份写的，沒有发表过，因内容与上文接近，故收在这里作为附录。

作先有若干缺点而后克服的人物。这还行？缺点，人是不愁沒有的，下决心克服，还怕终于克服不淨，为什么要立志“先有”呢？也許有人說：“本来嘛，我就不会沒有缺点，所以不怕有，有就讓它有。”可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不讓它有，努力克服它，缺点虽仍然会有，但却能少些、小些。若是“取法乎中”却要“仅得其下”，以至除缺点而外一无所有。这大概完全違背了立志的初衷了吧！

也許这完全是我的誤会。人家說的“有角有稜”根本不包括我說的第二层意思；而只是說要做一个有个性的、与众不同的人物。不过，这样的“立志”也是大有問題的。

这样的“立志”，要是針对着随声附和、缺乏独创性来說的，当然也有点道理。可是，把“有个性”、“与众不同”当作修养、努力的目标，却还是大錯的。一本优秀的小說，正面人物有个性，反面人物也有个性，英雄、落后分子、反动角色，一个个的都与众不同，各有各的个性。要做那一种“有个性”、“与众不同”的人物呢？——只說到这里，大概就可以弄清这样的“立志”“目标”是多么糊涂，多么沒有方向了吧！

我們說要发展青年人的个性，大概不是为发展个性而发展个性吧？我想，从教的方面說来，发展个性不过是因材施教，培养青年人成为各色各样的人材；在思想教育上要循循善誘，不要在小节上拘束青年，对他們的某些缺点應該容忍，而輔導他們把各自的优点突出的发展起来。从青年人自己方面說呢？发展个性，也无非发展自己的特長，而对缺点还要尽量克服。說个性不能忘了共性。培养青年人的共性，

我看就是把青年人培养为有能力（才）有德性（社会主义觉悟）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能力越大越好，社会主义觉悟越高越好。在这个前提下发展个性：才各有所长，爱好各有不同；生活习惯也不会全然一样，自然多半也会各有各的一点短处和缺点（虽然努力克服它）。若是离开这个共性、违背这个共性去发展个性，那会发展到什么地方去啊！

“与众不同”好不好？这样抽象的提问题，我看立这种志向的人，也是想不出妥善的答案来的。这要看“与众不同”的是什么？如果与众不同的是独特的才能，以及待人接物上的优点，当然是好得很喽！若是与众不同的是错误缺点，妨害同志妨害工作的坏脾气，大概不会认为是好的吧！这还是赶快改掉，与众“同”一点才好。至于日常生活习惯、爱好等等与众不同，这倒没有什么好不好；这，恐怕各有各的特点。但是，我们与人相处，一方面要承认人家的某些“不同”，不要强求人家一切与我相同，什么看不惯啦，讨厌人家的生活习惯啦……；而另一方面也要“善于人同”，在生活习惯上多迁就人家一点。这样才有利于团结。团结得好，大家才能工作得好，学习得好，生活得愉快。

我们想想自己看小说的体会：我们并不是因为某个人物有个性、有与众不同之处才喜爱他。例如高俅与梁山一百单八条好汉比，太“与众不同”了，这个人物的个性也是非常鲜明的；可是，我们却十分讨厌他。原来，我们喜爱的是高贵的道德品质和才能。各有各的个性的英雄人物，也有共性。我们喜爱上甘岭的英雄，也喜爱刘胡兰；既喜爱他们的共性

——高貴的革命的道德品質和英雄氣概，也喜愛他們的個性——體現在他（她）們身上的“與眾不同”的獨特才智、德性表現。

我們自己的努力、修養目標，為什麼可以只是要作“與眾不同”“有個性”“有角有稜”的人物，而不問是怎樣的“與眾不同”，是有怎樣的“個性”，怎樣的“稜角”呢？資產階級的“個性”、“稜角”也是一種個性、稜角啊！

有“稜角”，也許說的是勇于獨立思考，勇于發表獨立見解，提出與眾相反的意見來。青年人身上的這股銳氣，未嘗不是好的。“世故化”，磨去這個“稜角”是不好的。教師對青年的這種“稜角”要保護，不要去磨損它；而要去好好地引導它。可是把它作為修養努力的目標，為“稜角”而“稜角”，為提相反意見而提相反意見，……這就是目的，那可要糟糕的。人家說黑，明是黑的，我偏要說白；人家按時作息，我偏要鬧到十二點不睡覺；科學告訴我們這樣，我偏要說是那樣，……豈不成了怪人！這樣的“稜角”越多，越會與眾不合，人家只好避而遠之；自己落落寡合、孤獨得難受還是小事，而且——這裡不能不說得重一點——會完全失掉方向，還有很大的危險哩！

青年人是喜歡摹仿小說中自己喜愛的主人翁的。所以我再拉到讀小說上來談一談。小說上的正面人物常常不是沒有缺點的，作家常常是讓自己的人物通過生活、實踐鬥爭，克服缺點而成長起來；也有的終於還帶着一點缺點。我們讀小說，就要分清那是好“稜角”，去摹仿他，那是不好的“稜角”，

不要去摹仿，尤其是要看好“稜角”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不好的“稜角”是怎样逐渐磨掉的，从中吸取营养。“我对我喜爱的主人翁，万分佩服，难道还有取舍的余地？有缺点也罢，我达到那个样子就满不错了！”——这说法也有些道理。可是，我的答复还是那句话：“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如果任什么都摹仿，也可能只把缺点摹仿来，并且把它夸大呢？读古典小说更要注意这点。因为那里写的是与我们不同时代的人物。“水浒传”上的李逵是可爱的，我们把李逵的“角”和“稜”都学来，却未必那么可爱。“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是正面人物，可是谁做起现代的“贾宝玉”来，却只会被人觉得可笑和可憐，而且还不只是可笑可憐……。